



《记忆》134期

目 录

【专 稿】

董国强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江苏徐州个案研究

【访 谈】

杨东晓 留学中国：一个奇怪而矛盾的国度

——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口述

【要有光】

胡 杰 父亲“畏罪自杀”（版画）

依 娃 姑侄五人皆逃荒

【述 往】

崔龙浩 土改工作队队长与地主女儿的婚姻

安希孟 文革纪略——偷桃与爱书

徐米甘 北京西郊纺织大院回忆（一）

【资 料】

1. 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6月5日）

2. 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师《过河卒》战斗组成员安文江等四人给毛主席的信（1967年7月13日） 附：我们的决心

3. 首都中学志愿去边疆插队的革命小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11月）

4. 复旦大学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25日）

【读者来信】

1. 李逊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的重要差错勘误

2. 越人、汪春劫谈王海光文 3. 张晓良纠错

【版权声明】

【专稿】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

——江苏徐州个案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系 董国强

在现有的“文革”研究论著中，关于军队的角色和作用的专题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依笔者的浅见，这种状况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相对于自发性更强、社会影响更为广泛的地方群众运动而言，军队内部的“文革”运动依然受到部队纪律的制约。除了运动初期一些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机构中的造反派组织创办过一些群众报刊和其他非正式出版物外，军队各级指挥机关和介入“支左”工作的各地部队都没有留下此类历史文献。一些军队内部的命令、指示、工作报告、申诉材料等重要历史文件，也很少流落到社会上。因而长期以来，一般社会公众和史学研究者很少了解军队内部的“文革”运动情况。第二，当时的主流媒体和后来的官方历史叙事，往往对“文革”群众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众派性斗争采取一种简单化、概念化的叙事策略，把“文革”动乱的根源完全归结于少数人的个人野心和阴谋活动，将介入“支左”的军队塑造为一种制止社会动乱的正面力量。因而“文革”期间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支左”举措对地方群众派性斗争的消极影响往往被刻意回避。这也无疑大大增加了我们了解阐释相关问题的难度。

事实上，军队自1967年初便以“支左”名义正式全面介入地方事务，直到1972年以后才逐步淡出。而在不少地方，军队势力一直迁延到1973年或1974年才正式与地方事务完全脱钩。由此可见，军队在“文革”期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不足无疑是“文革”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同时也说明我们对十年“文革”的研究、理解和阐释还处于十分幼稚的阶段。

笔者以往关于南京地区“文革”运动的专题研究表明，“文革”期间学生群体内部、工人群体内部和机关干部群体内部都发生了派性冲突对抗。与此同时，

我们明确地知道军队内部也发生了派性冲突对抗。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军队内部冲突的起源及特征知之甚少，还较多地停留于零散的和感性的层面，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实证考察与理论阐释。

江苏徐州是“文革”期间全国范围的重灾区之一。自1967年1月发生“夺权”后，当地驻军奉命“支左”，全面介入当地的“文革”运动。很快，一个由军方主导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随后当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迅速分化成“支派”和“踢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群众派性斗争。到1968年夏秋“全国河山一片红”之际，徐州地区的派性斗争依然无休无止。为尽快实现徐州地区两市一专八县的“大联合”，中央不得不直接出面召集有关各方在北京举办“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然而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徐海班”内各种势力无法达成有效协议，而徐州当地的派性武斗也始终没有收到有效控制。最终，中央不得不于1969年夏做出决断，明确授权68军统一领导当地“三支两军”工作，实际上授权军队采取任何必要手段重建秩序。这项决策在短期内收到成效，然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全面整顿”和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当地群众派性斗争再度死灰复燃。

在笔者的访谈调查中，无论是当地原群众派性组织头头，还是一些离退休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也无论其“文革”期间的派性倾向如何，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徐州地区群众派性冲突问题的根子在军队。“文革”期间一首在当地流行甚广的打油诗，非常生动贴切地描述了徐州“文革”运动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群众派性冲突的根源：“写不完的检讨，清不完的罪，三年三个徐革会。你说支得好，他说踢得对，解放军支左没有罪？干部乱站队，老百姓活受罪。”¹那么，徐州地区“文革”运动进程究竟是怎样的？军队在“文革”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群众派性冲突与军队“支左”举措是否有关？军队内部是否存在派性冲突？如果存在派性冲突，其原始动因和持续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将依据笔者收集到的历史文献、回忆录文字和口述历史资料，系统概述“三年三个徐革会”的具体情况，深入探讨军队在“文革”中的角色和作用。这项研究得到许多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笔者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激。如果没有他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这个研究成果。不过出于众所周知

¹ 尤旭：《拾遗补缺——尤旭回忆录续集》，第377—378页，自印本，2004年。尤旭曾担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亲历当地“文革”运动。

的原因，笔者不便在此一一鸣谢。

驻徐部队一般情况

徐州市位于江苏、山东两省交界地带。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将原苏北行政区、苏南行政区和南京直辖市合并，重新设立江苏省，徐州市被划给江苏。1955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对全国军事防卫区划作出重大调整，分别在南京和济南设立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南京军区下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军区和上海警备区。考虑到南京军区所辖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海岸线较长，重要海口较多，中央军委决定将苏北海港连云港至徐州一线的军事防务划归济南军区。

基于上述情况，“文革”期间在徐州“支左”的部队既有隶属于济南军区的陆军68军、空29师和坦克2师，也有隶属江苏省军区（也即隶属南京军区）的徐州军分区部队和各级人民武装部，以济南军区的部队为主。68军同时担负徐州市卫戍区职责，是当地驻军中级别最高的单位。这种行政区划和军事防区的不一致性，是导致徐州地区“文革”运动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后来围绕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问题，济南军区的部队和南京军区的部队发生严重分歧，并逐步促成两大军区之间（主要是济南军区一把手、第一政委王效禹和南京军区实权人物、司令员许世友之间）的暗中对抗。或者说，两大军区以及江苏、山东两省革委会之间（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矛盾冲突，与徐州地区的群众派性斗争相互交织，是导致徐州问题节外生枝、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有必要指出，行政区划和军事防区的不一致性，并不是“文革”时期地方派性的主要根源。在1955至1966年期间，当地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出现过如此根深蒂固、影响广泛、旷日持久的派性冲突。就军队内部而言，在“文革”运动发生前，尽管驻防徐州的几支部队隶属两大军区，相互之间也没有直接统属关系，但他们一概以“兄弟部队”相称，关系十分融洽。由于68军首长职务级别最高，所以其他几支部队都唯68军马首是瞻。另一方面，虽然68军隶属济南军区，但是军长张铨秀在解放战争时期是许世友指挥的华野九纵下属的一个师长，副军长吴怀才和胡贤才则来自红四方面军，也与许世友有相当的历史渊源。这是维系

68军和南京军区部队的一条重要的感情纽带。1967年初中央要求军队“支左”，两大军区一致同意徐州“支左”工作由68军负总责。其他几支部队均服从两大军区的命令，团结一致介入“支左”工作。不过这种状况因下列事件的发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发生改变。

军队“支左”和第一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

在“文革”运动初期，徐州当地的矛盾冲突和运动发展轨迹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最初的群众派性冲突主要存在于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当地较为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包括“淮大八·三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八·一红卫兵总部”、“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红总”）、“徐州三司”等，而较为著名的“保守派”组织则包括“徐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军”、“革命工人纠察队”等。¹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带动下，当地“造反派”组织纷纷自发地向传媒机构和党政机构“夺权”，其中声势较大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于21日宣布向市委和市人委“夺权”。²“一·二一夺权”行动导致徐州市委彻底垮台，保市委的“保守派”组织随即土崩瓦解，徐州成为“造反派”的天下。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³1月28日，以68军为首的徐州驻军奉命正式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军方领导人希望尽快召集各大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会议，通过协商组成一个“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正式组建过渡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68军司令部处长吕文俊等人受命具体负责此事。2月2日，徐州市“大联筹”成立，共有11个造反派组织、26个单位参加。⁴

¹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79—3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²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8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³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

⁴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关于王效禹同志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四论徐州两条路线的斗争》，《徐州红卫兵》，1968年8月14日；《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徐革会”》，《徐州反到底》，1967年8月15日。

不过军方强势介入并在实际上接管地方权力，与当时主流媒体上大肆鼓噪的“造反就是要夺权”、“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口号相互抵牾。因而，军方主导的“大联合”努力遭到来自“红总”等造反派组织的暗中抵制。军方随即发起一场“镇反”运动，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并逮捕了“红总”的主要头头李长荣（农机厂工人）、王宜玺（公共汽车公司工人）、栾昌善（重型机械厂工人）。“徐州三司”（主要头头是徐州医学院学生徐峰）等群众组织试图替“红总”辩护，也遭到军队镇压。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全市有34个群众组织遭到取缔，146人遭到逮捕，另有数千人在本单位接受“群众专政”。¹这就是一些史料所称的“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

在“二月镇反”的暴力威慑下，多数造反派群众组织不得不与军方合作，其中包括铁路系统工人组织“火车头总部”。该组织全称为“徐州铁路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头头是火车司机杨正祥，在当地具有很大政治影响。当然，也有一些造反派组织因各种机缘巧合和利害关系，真心诚意地拥戴军方掌权。例如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八·一红卫兵”头头张晓阳的父亲是徐州军分区领导，其他骨干成员也多为军队干部子弟，故而拥军立场坚决。“淮大八·三一”（头头是徐州师范学院学生吴方新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头头是徐州一中学生胡小柱等）、“红农会”（头头是郊区农民朱成明等）等组织也一直与军方保持良好关系。

3月18日，第一个徐州市革委会宣告成立，俗称“三·一八”革委会。革委会成立之前，68军党委同时向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提交过报告，得到两大军区批准。这个事实表明，当时两大军区处理徐州问题的立场完全一致，属地原则并未干扰恢复秩序的努力。革委会由44名委员组成，68军副政委刘汝贤出任主任。同时结合了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包括原市委领导班子成员吴明政（市长）、王铁民（副书记）等人。许多造反派头头也在革委会中占有一席之地。革委会委员中的“群众代表”包括“红农会”头头朱成明、“火车头”头头杨正祥、《徐州日报》社造反派头头田超、“淮大八·三一”头头吴方新、“八·一红卫兵”头头张晓阳等，其中朱成明还当选革委会副主任。²不过这些“群众代表”实际

¹ 《谁代表斗争大方向？》，《徐州红卫兵》，1968年7月31日；《谁是革命三结合方针的捍卫者？》，《徐州红卫兵》，1968年9月15日。

²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徐革会”》，《徐州反到底》，1967年8月15日。

上处于权力的边缘。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尽管“群众代表”的人数占到革委会委员人数的36.6%，但在6名正副主任中，只有1名“群众代表”；在14名常委中，部队干部6人，地方干部5人，“群众代表”3人；而在3月19日成立的掌握实权的11人“核心小组”中，没有一个“群众代表”。¹这显然引发了一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严重不满。

4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7号）被转发全国。该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者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²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对造反派的先锋作用和政治忠诚给予高度肯定，指出，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立场路线问题，要求对污蔑、攻击“革命小将”的言行予以坚决回击。³几天后，中央军委发出“十条命令”，再次重申了中央117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并特别提到“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⁴

在上述背景刺激下，徐州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杨正祥为首的一部分造反派头头反戈一击，公开鼓噪为“红总”和“徐州三司”等群众组织平反。当这个主张遭到军方拒绝后，他们进而主张踢开军方主导的“三·一八”革委会。而以“淮大八·三一”和“八·一红卫兵”为核心的一些群众组织，则主张继续支持军方和“三·一八革委会”。至此，徐州的造反派组织公开分裂为“踢派”和“支派”。“踢派”还于5月初成立了统一组织“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简称“徐州反到底”。⁵

军队“支左”人员对中央态度的180°转变感到困惑与不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对中央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阳奉阴违，既没有为“红总”等群众组织平反，也没有释放被抓捕的群众组织头头。5月上中旬，张春桥奉毛泽东之命，南下山东、江苏等省调处群众派性冲突。他在南京召见68军军

¹ 《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徐革会”》，《徐州反到底》，1967年8月15日；《刘汝贤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2月1日。

²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1967年4月1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

³ 《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人民日报》，1967年4月2日。

⁴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1967年4月6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

⁵ 《徐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4.1—1968.3.1.）》，《徐州红卫兵》，1968年2月29日。

长张銓秀、副政委刘汝贤、副参谋长裴维增，以及“支派”头头田超、吴方新、张晓阳，要求他们做好团结“踢派”的工作。此后徐州军方不得不于5月16日发出了一个“平反公告”。但是军方领导人拒绝改组“三·一八”革委会，尤其反对将“红总”头头栾昌善、李长荣、王宜玺等人增补为常委。¹获得平反的“红总”和“徐州三司”随即加入“踢派”，使得“踢派”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

军方被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捆住手脚，不得不改变政治策略。他们暗中扶持“支派”与“踢派”对抗，谋求以武力手段打垮“踢派”。他们对“支派”头头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对军队讲的，不是对群众说的”；“踢派和我们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有敌我矛盾的因素”。他们还进行了以下工作：第一，帮助“支派”成立了一个“徐州市批判刘邓统一指挥部”，并在城区和郊区成立了四个分指挥部，大大提升了“支派”的组织整合程度。第二，帮助“支派”组建了一个“三·一八棒子团”，该组织在后来的派性冲突中发挥了攻坚作用。第三，与“支派”一唱一和，积极扶持所谓新“红总”和新“火车头总部”，试图在“踢派”内部另立山头，从组织上分化瓦解“踢派”。²在此背景下，从5月中旬开始，“支派”和“踢派”之间武斗不断。

5月31日，“支派”和“踢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踢派”主力被打出徐州。68军“支左”人员吕文俊、朱博义、赵振川等人暗中参与“支派”的策划部署，尔后又借口执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袖手旁观。³这次武斗造成1200余人受伤，6人死亡。⁴杨正祥和其他“踢派”头头不得不以退为进，率领数千“踢派”群众到上海找张春桥告状，到南京找江苏省军管会告状。在上海、南京两地交涉无果后，他们又转赴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

徐州军方和“支派”则致力于巩固胜利成果。6月29日，徐州市革委会和徐州卫戍区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踢派”和“支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时指出“踢派”要求踢开市革委会是错误的。声明还强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全市红卫兵应该以

¹ 《田超谈话记录》抄件，1988年1月2日。此件由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

² 《刘汝贤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2月1日。

³ 《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徐革会”》，《徐州反到底》，1967年8月15日；《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徐州红卫兵》，1968年8月24日；《段玉成揭发吕文俊在“文革”中干的坏事摘记》，1985年7月24日。此件由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段玉成是徐州“支派”头头之一，后来与“踢派”联合。

⁴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89—39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左派为中心实现大联合。¹

简而言之，徐州“夺权”以后的群众派性冲突，与军队介入当地“文革”运动有着直接关联。军方的强势介入，在不同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引发意见分歧。而“镇反”直接导致军队与一部分造反派公开决裂。尽管军队联合多数造反派建立了“三·一八”革委会，然而这个过渡性权力机构的政治权威在中央舆论导向发生巨大变化时受到严重削弱，革委会内部衍生出“踢派”。军方转而暗中扶植“支派”以武力方式解决派性纠纷，使得当地两派的派性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然而至此为止，军队内部还保持一致。

王效禹奉命处理徐州问题

徐州“踢派”到处告状，最终引起中央对徐州问题的重视。于是，中央指派济南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兼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出面处理徐州问题。事实上，徐州问题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全国各地一个普遍现象。在王效禹受命解决徐州问题前后，中央还指派谢富治、王力赴西南各省调处群众派性冲突。毛泽东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赴武汉调处武汉军区与地方造反派的矛盾。

王效禹出生于山东益都县农民家庭，当过纺织工人，抗战时期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后来因保护一位“右派”下属，在1959年受到降职处分。1965年调任青岛市副市长。1966年夏天“文革”运动爆发后，他很快公开亮相支持红卫兵造反，得到毛泽东的表彰，成为全国闻名的“革命领导干部”典型。1967年1月，他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向青岛市委“夺权”。2月初，他又带人赴济南向山东省委“夺权”。随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成为一把手。像这样得到最高当局信任的“革命领导干部”，除王效禹外全国范围只有4人——上海的张春桥、黑龙江的潘复生、山西的刘格平和贵州的李再含。4月初中央政策导向发生逆转后，为促使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袁升平等人“转弯子”，王效禹又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²（大致同时，

¹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90页，出处同上。

² 王效禹简介，百度网站。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j23Eayb-w2eo-wUtSSGqZvkB86DMgi9pxKraqu1MCRBvoWAWgkg6AZRTFBUM1S_NKkgCnVCnhK7Y6EsJDFaa，2014年12月13日登录；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新浪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c2160e0101j94.html，2014年12月15日登录。齐晋华是当年“支左”人员。

张春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潘复生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刘格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中央指派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毫不奇怪。当时在江苏省掌权的省军管会，主要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干部组成，后台老板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当地驻军和其他地方的军队一样，也在1967年初奉命“支左”，也对少数激进群众组织实施了“镇反”。进入4月份以后，他们因为思想不通，暗中策动拥护军方的“屁派”与反对军方的“好派”对抗。5月份毛泽东任命张春桥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派他前往南京调处军队和两派关系。在张春桥发表“五一四”讲话以后，当地军方依然故我，一直拖到7月下旬才对在“镇反”期间受到打压的造反派组织和个人作出平反决定。¹由此可见，南京军方领导人的思想情绪与徐州军方领导人的思想情绪完全一致，中央不可能依靠他们做徐州驻军的“转弯子”工作。而王效禹是“文革”期间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扶植起来的干部。他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赢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高度信任，首先在于他步步紧跟政治潮流走向。而且，他是1967年5月份被任命为济南军区一把手的，与此前军队“支左”工作毫无瓜葛，所以执行中央新政策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王效禹于7月5日抵达徐州。他认为当地驻军“支左”工作大方向错了，现在应该“转弯子”。针对军方领导人提出的以“支派”为中心实现“大联合”的主张，他强调“要走第三条道路”——即放弃以“支派”或以“踢派”为中心的提法，看谁的革命性强，谁的革命旗帜举得高，就以谁为中心。²军方领导人认为王效禹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变相支持“踢派”。他们对此进行坚决抵制。

于是，王效禹分别召集当地驻军师以上干部、团以上干部、营以上干部会议，在中下级干部中争取支持。结果空29师最先转变立场。³7月11日，该师党委向空六军、济南军区、空军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提交《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并表示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贯彻执行王效禹的指示，坚决支持“踢派”的革命行动，同时做好“支派”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一起把方向转过来。王效

¹ 详见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Local Politic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une Issue, 2011.

² 《关于王效禹同志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四论徐州两条路线的斗争》，《徐州红卫兵》，1968年8月14日。

³ 《穆正身在“徐海班”大会上的发言》，时间不详，应该在1969年5—7月间。此件由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穆正身时任68军政治部主任，是“支派”支持者。

禹随即以济南军区党委的名义对此做出肯定性批复，转发所属部队。¹在巨大政治压力之下，68军党委不得不于7月13日发表一封“公开检查信”。但是党委内部认识并不统一，大多数人依然思想不通。

7月20日，震惊全国的“武汉事件”发生，中央高层的态度更趋激进。7月22日，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对空29师的报告作出批复，认为这个报告“很好”，还表彰该师“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是全军都应该学习的榜样”。²消息传来，空29师干部战士和“踢派”群众欢心鼓舞，分别于24日和25日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军民武装大游行。在此背景下，坦克2师和68军下属203师领导人也迅速转变立场。只有68军党委中的一些人和隶属江苏省军区的徐州军分区继续保持僵硬立场。

为了排除干扰，王效禹决定彻底架空68军党委。他新设立一个“徐州支左指挥部”，任命转变立场的68军政委李布德、副军长胡贤才、副参谋长祖岳嵘、空29师师长郭子谭、坦克2师师长邢同立、203师政委金波等人组成。同时成立一个新卫戍区党委，以李布德、郭子谭、祖岳嵘为核心。³这两个新机构名义上在68军党委领导之下，实际上取代了68军党委。7月24日，王效禹认为大局已定，离开徐州返回济南。

然而王效禹的徐州之行并未真正解决当地派性问题。68军的主要领导人慑于王效禹的权威不敢轻举妄动，“支派”群众组织却并不把王效禹放在眼里。他们不断在当地挑起事端。7月12日，一些“支派”成员在空29师驻地围攻、推打王效禹，空29师派人逮捕现场“支派”头头李金山，才将“支派”群众吓走；7月23日，一些“支派”成员伏击、殴打总字264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坦克学校）战士，抢走军车；7月24日，“踢派”为庆祝中央“七·二二”批示举行集会游行，遭到一些“支派”成员冲击；8月5日，“支派”头头和持“支派”观点的“革命领导干部”宣布集体退出“三·一八”革委会，对军方转变立场表示不满；8月26日，一些“支派”成员冲击“支左指挥部”，围困郭子谭；8月27日，一些“支派”成员拦截、质询李布德；8月29日，一些“支派”成

¹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南京军区党委转发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1967年7月22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

²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南京军区党委转发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1967年7月22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

³ 《杨得志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2月1日；《穆正身在“徐海班”大会上的发言》；《祖岳嵘揭发郭子谭材料》，1985年4月7日。此件有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

员袭击空 29 师汽车，打伤 3 名战士；8 月 30 日，一些“支派”成员拦截张銓秀和李布德乘坐的汽车，要求与他们辩论。¹

68 军军长张銓秀等人一方面不得不顺应政治潮汐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存在侥幸心理，因而政治态度经常左右摇摆。²例如在武汉“七·二〇事件”持续发酵的背景下，“踢派”于 8 月 8 日召集“踢开徐革会，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大会，张銓秀应邀与郭子谭、邢同立等人出席大会，并做了支持性的表态发言。但当社会上谣传张春桥、周恩来有谈话批评王效禹时，68 军和徐州军分区领导人又如获至宝，立即公开否定王效禹的路子，公开对抗新卫戍区党委和“支左指挥部”。³军内高层的这种摇摆心态，无疑是对当地群众的派性斗争火上浇油。

8 月 31 日是“支派”核心组织“淮大八·三一”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支派”方面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踢派”针锋相对，在同一天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结果两路人马在街头遭遇，爆发大规模武斗事件。“支左指挥部”的郭子谭等人认为，这场冲突的性质与武汉事件的性质一样，应该按照毛泽东“要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的指示，给“踢派”发枪。他们于下午 4:00 请示济南军区，晚上 7:00 得到军区的批复，晚上 10:00 付诸实施，总共给“踢派”发枪 1000 多支。⁴王效禹在后来的一份检查中提到，这次发枪向中央发过电报，并口头请示过周恩来。⁵

获得“支左指挥部”支持的“踢派”很快在武斗中占据优势。从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踢派”持续五天围剿“支派”。山东枣庄、薛城、兖州等地 8000 多名持相同观点的造反派，也在王效禹授意下赶往徐州参战。这次武斗造成双方 23 人死亡，400 余人受伤，“支派”数千人流亡上海、南京等地。9 月 4 日，“踢派”在市体育场召开 10 万人“抗暴自卫祝捷大会”，宣读《告全市人民书》。张銓秀代表徐州卫戍区在大会发言，表示驻徐部队毫不动摇地站在徐州“踢派”一边，祝贺“踢派”组织取得抗暴自卫的胜利。⁶

¹ 《乐在淮海战恶风——八三一反革命暴乱纪实》，《红色火车头》，1967 年 9 月 11 日；《“拥军派”的庐山真面目》，《徐州红卫兵》，1968 年 7 月 25 日。

² 《张銓秀军长谈徐州文化大革命问题》，《徐州工人》，1968 年 7 月 10 日。

³ 《杨得志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 年 12 月 1 日。

⁴ 《郭子谭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 年 12 月 1 日；《祖岳嵘揭发郭子谭材料》，1985 年 4 月 7 日。

⁵ 《王效禹的检查》（1968 年 6 月 1 日），《一月风暴》，1969 年 9 月 6 日。

⁶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 390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穆正身在“徐海班”大会上的发言》。

9月至10月间，与王效禹关系密切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被清洗的消息传到徐州，68军党委常委内部就“八·三一”事件再起争端。他们秘密召开6天半的会议。军长张铨秀、副军长吴怀才等大多数常委认为“八·三一”事件大方向完全错了。政委李布德等人认为大方向正确，只是打击面宽了一点。他们还强调68军党委应该与王效禹保持一致。结果，大多数常委否定了少数人的意见。王效禹闻讯后，立即下令在济南召开68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王效禹和军区其他领导人参加会议，一起逼迫68军多数常委“转弯子”。¹

王效禹的强势源于中央高层的信任。9月间，中央高层特意安排访华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谢胡访问山东。10月下旬，《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关于济南军区67军“三支两军”工作经验的报道。该部队在山东青岛“支左”，是王效禹树立的另一个先进典型。²这些动作都是中央高层力挺王效禹的信号。在此背景下，杨得志在68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强调徐州两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没有调和折中的余地。他提到新的徐州卫戍区党委不是派性的产物，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他表示坚决支持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他还严厉批评68军领导人，警告他们“不要背后搞小动作，唱对台戏”。³

在济南军区领导层的高压威慑之下，11月10日，68军党委常委向济南军区作出“初步检查”。11月11日，张铨秀在徐州“踢派”召集的“欢迎68军首长赴济开会胜利归来”大会上讲话，向“踢派”道歉，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一错再错”，乞求批评和原谅。⁴11月19日刘汝贤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代表68军检讨，表态要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教育，做好机关部队的转弯子工作，严格遵守各项命令规定，绝对禁止军内外相互串联，禁止擅自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动用军队车辆，窃听电话，窝藏军外人员，干涉地方“四大”。他还要求各级干部要做好家属子女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参加“支派”组织的，积极教育他们认识错误，向“反到底总部”靠拢。⁵68军领导人的上述表态令“踢派”欢欣鼓舞。11月28日，他们冲进拒绝转变立场的

¹ 《杨得志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2月1日；《穆正身在“徐海班”大会上的发言》。

² 《一切行动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6073部队党委领导“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9日。

³ 《杨得志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2月1日。

⁴ 《张铨秀通知在“欢迎六十八军首长赴济开会胜利归来”大会上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1月18日。

⁵ 《刘汝贤同志的讲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2月1日。

徐州军分区大院，把数百军人赶走，还高呼口号：“南京部队滚出徐州城”。¹

另一方面，根据王效禹的指示，“支左指挥部”和“踢派”组织于9月至12月间4次派专列去上海接“支派”成员回徐。上海方面也奉张春桥之命停止接待“支派”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以韩登云（徐州电机厂工人）、段玉成（徐州电机厂工人）、朱成明、杨炳坤等人为首的一部分“支派”成员陆续返回徐州。²12月23日，“踢派”在徐州召开了一个欢迎“支派”回徐州大会，“踢派”头头杨正祥、杨卫东（话剧团演员）、王宜玺等人与回徐“支派”头头相继发言，握手言欢，努力营造一种两派“大联合”的热闹景象。³

其次，根据王效禹的指示，“踢派”于11月上中旬组成一个以杨正祥为首的“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赴京代表团”，到北京游说各有关方面。此时，江苏各方代表已经奉中央之命，组成“江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大联合”事宜。南京“好派”头头文凤来和“屁派”头头曾邦元分别在西苑旅社接待“踢派”代表团，均向他们表示支持。⁴杨正祥等人还到京西宾馆拜见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吴大胜，逼迫他就以下问题表态：（1）现在徐州有人反对王效禹，反对空29师，请省军管会予以足够重视；（2）68军已就改组徐州市革委会问题向中央和两大军区提交报告，请省军管会尽快研究予以批复；（3）请省军管会动员“支派”在宁人员尽快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4）解决干部问题。吴大胜做出如下答复：（1）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2）江苏省军管会不考虑重新处理徐州问题，（3）会帮助劝说“支派”回徐州，（4）会研究徐州市革委会改组问题。⁵

1月16日，徐州“踢派”召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王效禹、杨得志、张銓秀、李布德、郭子谭出席。杨得志在大会上说：“王效禹同志处理徐州问题，他的路子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们认为好得很！任何人都破坏不了！”⁶

¹ 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新浪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c2160e0101jj94.html，2014年12月15日登录。

² 《谁代表斗争大方向》，《徐州红卫兵》，1968年7月31日。

³ 《徐州反到底总部召开欢迎支派负责人韩登云等同志大会》，《徐州反到底》，1967年12月27日。

⁴ 《与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赴京代表团会谈时，南京造反派在京代表团负责人谈话纪要》，《红色火车头》，1967年11月26日。

⁵ 《吴大胜在接见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赴京代表时的谈话》，《红色火车头》，1967年11月26日。

⁶ 《杨得志在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话》，《徐州红卫兵》，1968年1月17日。

综上所述，王效禹对徐州问题的处理，不但未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反而导致驻徐部队内部的分裂。他虽然可以利用职权对当地的政治格局作出调整，但在一部分“支左”人员积极贯彻其指示的同时，另外一部分“支左”人员与“支派”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他曾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但实际上徐州依然保持“一派掌权”的政治格局，只不过是“踢派”取代了“支派”。这种政治格局得以形成并得以维持，关键在于王效禹得到中央高层的信任和授权。一些当年的“支左”人员在访谈调查中强调，他们积极贯彻执行王效禹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意效忠王效禹个人。支持王效禹是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是在贯彻执行济南军区和68军两级党委的决议。这个说法值得我们注意。

中央“二·六”命令和第二个徐州市革委会

“八·三一”武斗事件之后，数千“支派”成员在吴方新、韩登云、朱成明、黄其甲（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职工）、马吉昌（徐州电信局职工）、滕尚民（团市委干事）、朱宝江（6105厂中层干部）、张晓阳、胡小柱等人带领下重施“踢派”故技，流亡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寻求外部支持。9月中旬，他们在上海成立新的“支派”统一组织“淮海·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淮海八·三一”，意谓要为“八·三一”事件报仇雪恨。进入10月以后，一部分“支派”成员陆续返回徐州与“踢派”联合，但大多数“支派”骨干不愿返回徐州。在上海方面向他们发出逐客令后，他们转而以南京为大本营，坚持反对王效禹和“踢派”。在南京同盟者的帮助下，他们被安置在朝天宫博物馆、江苏教育学院和宁海中学住宿。¹

10月初，赴北京活动的黄其甲打电话给吴方新，谈到徐州市内的“支派”群龙无首，在军队和“踢派”打压下士气低落，提议吴方新返回徐州做些发动组织工作。10月7日，吴方新秘密潜回徐州，暗中联络当地“支派”进行反对王效禹和“踢派”的活动。在此期间，“支派”另一主要头头田超也从北京秘密返回徐州。不久，他们的行踪被“踢派”发觉，不得不逃往南京。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又有一些“支派”群众陆续前往南京，使得当地“支派”人数达到2000

¹ 《“淮海八三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土匪集团》，《徐州红卫兵》，1968年5月25日；《遗臭万年的罪恶史——“淮海八三一”罪行录》，《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30日。

多人。¹

田超出身于徐州沛县农民家庭，参加过人民解放军，后转业至《徐州日报》社工作。“文革”前他因工作事故受到处分，从中层干部沦为一般职工。这导致他对单位领导的不满。“文革”爆发后，他逐步成为徐州“支派”主要头头之一。²这次他和吴方新抵达南京后，在群众中发表鼓动演说，阐释了“支派”的基本立场和斗争策略：“徐州是江苏的地方，只能江苏军管会管，山东没有权力”；“我们两千多人在南京不走，给军管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无形中也给中央有压力，我们就说这是王效禹在徐州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叫中央表态。”³

11月初，在宁“支派”作出领导班子调整，成立由田超、马吉昌、吴方新、张晓阳、胡小柱、韩登云、滕尚民、朱宝江、李金山、朱成明、朱林（汽车运输公司站务员）等十一人构成的“淮海八·三一”常委会（其中李金山、朱林因在王效禹赴徐期间表现过激，遭到军方逮捕，当时依然处于关押之中）。随后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田超任组长，吴方新、马吉昌任副组长，组员张晓阳、滕尚民。⁴这次领导班子调整引起韩登云、朱成明等人的不满。他们遂带领一些“支派”群众返回徐州与“踢派”联合。

11月6日，在宁“支派”常委会确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决定串联丰县、沛县造反派孤立徐州。同时，他们还想把徐州周边几个煤矿和郊区及铜山县几个公社串联起来，开辟根据地。他们的目标是早日打回徐州报仇雪恨。

⁵

1968年1月上旬，田超前往北京与黄其甲商议军事行动计划。返回南京后，田超又于17至18日召集在宁“支派”头头秘密商议，制定了一个三路进攻方案：一路由吴方新带领，先期进城占据徐州军分区大院，掌握68军情报，伺机抢枪并攻占邮局、印刷厂；一路由田超、张晓阳、胡小柱带领，在徐州南郊渔沟、桃山集等地秘密集结，必要时实施破路炸桥行动，一方面制造事端引起中央重视，

¹ 《遗臭万年的罪恶史——“淮海八三一”罪行录》，《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30日。

² 笔者对两位徐州“文革”知情者的访谈，徐州，2014年10月25日。

³ 《“淮海八三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土匪集团》，《徐州红卫兵》，1968年5月25日；《遗臭万年的罪恶史——“淮海八三一”罪行录》，《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30日。

⁴ 《“淮海八三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土匪集团》，《徐州红卫兵》，1968年5月25日；《一群乌龟王八蛋的乌合——揭开淮海八三一反革命土匪集团组织内幕》，《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24日；《遗臭万年的罪恶史——“淮海八三一”罪行录》，《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30日。

⁵ 《田超之流在反动道路上越滑越远》，《徐州反到底》，1967年12月27日；《遗臭万年的罪恶史——“淮海八三一”罪行录》，《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30日。

另一方面阻断徐州“踢派”与山东、安徽及苏北同盟者的联系；一路由马吉昌带领留在南京，等战事爆发后大造舆论，将责任归咎于王效禹和“踢派”，争取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的支持。不久，黄其甲又从北京打电话给南京“支派”头头，催促他们尽快实施炸桥破路行动。¹

在“支派”上述活动的背后，隐约可见一些68军“支左”人员的身影。有资料显示，吕文俊（68军司令部处长）曾于9月下旬打电话给流亡在上海的吴方新，指示他“尽量求见张春桥，坚持斗争”。吕文俊、朱博义（68军司令部处长）、傅德修（68军后勤部科长）等人还先后秘密前往上海与“支派”头头田超、吴方新、马吉昌、张晓阳等人串联密谋，支持他们向中央施压。10月中旬，吴方新潜回徐州串联当地“支派”进行反王斗争，来去都由吕文俊等人安排军车接送。他们还秘密安排吴方新在徐州卫戍区大院内住宿。田超在“八·三一”事件后前往北京等地避难，68军副军长吴怀才的妻子高×（徐州市民政医院党支部书记，“支派”观点）曾私下向他提供粮票和钱款。他于10月返回徐州，也得到高×和吕文俊的暗中帮助。后来田超在徐州无法立足，吕文俊等人又凑钱资助他前往南京。吕文俊还嘱咐吴方新在“支派”群众中做些工作，帮助田超树立领导权威。²

此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已经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安然度过南京“红总”策动的“倒许”风潮。他对“文革”群众运动的真实态度和处置办法，与68军党委中的多数人完全一致。他看不起靠“造反”起家、在济南军区发号施令的王效禹，对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也不认同，所以对徐州“支派”在南京逗留表示默许。另一方面，徐州军分区受到王效禹和“踢派”压迫，也派人到南京争取支持。军分区副政委刘显模甚至长住南京活动。他多次与“支派”头头暗中接触，相互依靠，相互支持。这也对江苏省军管会和许世友本人产生巨大影响。1968年初，“支派”在南京教育学院举行会议，会上有人传达了许世友的一个讲话，使“支派”成员士气大振。³

1月下旬，吴方新返回徐州与“支左指挥部”交涉“支派”返回徐州事宜。

¹ 《看！反革命土匪集团的反动计划》，《徐州反到底》，1968年2月14日；《狼心狗肺——揭穿马吉昌之流的一个罪恶阴谋》，《徐州工人》，1968年5月8日。

² 《“淮海八三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土匪集团》，《徐州红卫兵》，1968年5月25日；《遗臭万年的罪恶史——“淮海八三一”罪行录》，《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30日；《段玉成揭发吕文俊在“文革”中干的坏事摘记》，1985年7月24日。

³ 《段玉成揭发吕文俊在“文革”中干的坏事摘记》，1985年7月24日。

1月23日，军方向他转达了张銓秀的电话指示，表示欢迎“支派”回徐州，但不能集体住宿，要回到各单位。¹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派”返回徐州的首要前提是承认“支左指挥部”和“踢派”掌权的现状，彻底放弃对抗。吴方新随即返回南京向“支派”头头们通报交涉结果。他们一致认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决定采取极端行动。在南京教育学院举行“动员誓师大会”之后，数百“支派”成员陆续前往徐州南郊实施事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2月1日，田超在徐州南郊金庵村召开会议，正式下达炸桥破路命令。²3日凌晨，一些“支派”成员在桃山集附近炸毁炸桥铁路桥4座，公路桥2座。在此前后，他们还抢劫客车2次，货车5次，向护路部队抢枪4次，抢得枪支47件。³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徐州至南京浦口火车停运85小时，徐州至郑州停运83小时，华东铁路系统一度瘫痪，实际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徐州炸桥破路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中央高层的震怒。2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并附上铁道部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⁴2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紧急命令，指出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犯有上述罪行的人绝不是“革命造反派”。命令要求护路部队和铁路沿线公安人员对实施犯罪的极少数坏头头“坚决镇压法办”，如遇犯罪分子抵抗和逃窜时，军队必须进行追击，务期达到聚歼的目的。⁵

中央授权济南军区执行“二·六”命令，南京军区配合执行。两大军区随即抽调两团兵力，由68军军长张銓秀统一指挥，在徐州南郊和西郊一带围捕有关人员。结果，在参与破坏行动的“支派”头头中，张晓阳等人在与围捕部队遭遇时发生交火，受伤被捕。吴方新等人被捕，因认罪态度较好，有检举揭发、立功赎罪表现，在短暂羁押获释。田超化妆逃脱，逃往东北某地藏匿，几个月后才被

¹ 《狼心狗肺——揭穿马吉昌之流的一个罪恶阴谋》，《徐州工人》，1968年5月8日。

² 《请看反革命土匪的真面目——剖析匪首田超的一篇黑话》，《徐州工人》，1968年5月8日。

³ 《关于在执行二六命令中对抓获人员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文件残缺，时间不详，应该在1968年2月中下旬。此件有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愤怒声讨田吴张反革命土匪集团滔天罪行》，《徐州红卫兵》，1968年2月10日。

⁴ 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新浪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c2160e0101j194.html，2014年12月15日登录。

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1968年2月6日。

抓获。¹

68军随即派人组成一个“特别集训队”，负责看管和审讯被捕获的涉案人员。根据“特别集训队”不久后提交的审讯报告，这次炸桥破路行动共涉及327人，其中28人来自安徽，299人来自徐州。在这些人中，属于煽动、策划、指挥者14人，受蒙蔽群众109人，军队涉案人员170人。²“特别集训队”在报告中拟定的处理意见包括：（1）按照军地分离的原则，军队人员另案调查处理。

（2）绝大部分涉案的一般“支派”成员，分批释放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马吉昌等9名为首者拟逮捕法办。另有若干为首分子拟逮捕法办，或者交群众管制劳动。还有一些为首分子如吴方新等人因认罪态度好，有检举揭发、立功赎罪情节，从轻处理。³这份报告被逐级上报至68军党委、济南军区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周恩来和代总长杨成武基本同意上述处理意见。杨成武在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时说：要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布置大胆干。要快要好。……所抓到的人一律不放。送到适当的地方，搞清幕后策划者。⁴

68军党委根据中央和济南军区指示，决定由副政委刘汝贤挂帅，军政治部保卫处长王涌泉具体负责，再次对捕获人员进行审讯。⁵这次审讯发现，68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王致祥等在接到中央“二·六”命令后，第一时间便通过军内其他部门人员向“支派”头头发出警报。后来，他们又通过同样方式将围捕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透露给“支派”头头。进一步的审讯还发现，68军、徐州军分区、徐州市人武部的部分“支左”人员与“支派”一直有接触，参与过“支派”挑动武斗和抢劫枪支的密谋。还有人揭发，围捕部队曾在行动中抓获了68军副军长吴怀才的夫人高×。后来在68军高层的秘密干预下，高×被悄悄放走。还有人揭发，徐州军分区副政委刘显模在炸桥破路行动之前，参加过“支派”在南京举行的动员誓师大会，在大会上做了鼓动性讲话。关于刘显模的揭发材料上报中央后，周恩来立即命令南京军区逮捕刘显模，用专机押送到徐州，移交给济南军区专案组。许世友执行了中央的命令。⁶

¹ 《匪首田超落网》，《徐州红卫兵》，1968年7月4日。

² 《关于在执行二六命令中对抓获人员处理意见的报告》。

³ 《关于在执行二六命令中对抓获人员处理意见的报告》。

⁴ 《杨代总长传达周总理对二六命令的指示》，《徐州红卫兵》，1968年2月20日。

⁵ 郑向玉申诉材料：《执行中央二六命令遭政治迫害》（初稿），2008年6月20日。此件由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郑向玉为68军政治部保卫处刑侦干事，参与过审讯工作。

⁶ 《王德清来长途电话》（李玉顺整理），1968年2月24日。该文件是审讯记录要点报告，由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杨代总长传达周总理对二六命令的指示》，《徐州红卫兵》，1968年2月20日；祖岳嵘：

鉴于68军和其他驻徐部队均有多人卷入“支派”破坏活动，济南军区下令在山东潍坊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由军区直接派出专案组负责进一步审理工作。但是在案件移交之前，68军副军长郑统一指示“特别集训队”负责人销毁了原始审讯记录。¹因而潍坊特别军事法庭的审理最终不了了之，军内关押人员在7月份被全部释放。不过从短时间看，炸桥破路事件和中央“二·六”命令使得“支派”和支持“支派”的军方人员遭受重创——这似乎有力证实了王效禹对徐州“踢”、“支”两派属性的判断。

在上述背景下，一个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3月1日宣告成立，俗称“三·一”革委会。“踢派”头头杨正祥当选主任委员，祖岳嵘（68军副参谋长）、韩本初（原徐州市委书记）、吴明正（原徐州市市长）、栾昌善（“踢派”头头）、周美霞（徐州师范学院学生、“踢派”头头）等人任副主任委员。这个革委会获得济南军区和中央批准。3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徐州市革委会成立。3月8日，《人民日报》也发布了徐州革委会成立的消息。

表面看来，“三·一”革委会较之此前的“三·一八”革委会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第一，“踢派”头头杨正祥、栾昌善、周美霞当选主任和副主任，似乎凸显了“群众代表”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返回徐州的“支派”头头朱成明、段玉成、杨炳坤、周良欣等也被结合进革委会，似乎体现了“大联合”精神。第三，原徐州市委书记韩本初获得“解放”，在被结合的“革命干部”中位列第一，似乎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不过实际上，当地权力依然掌握在军队干部手里。3月10日，济南军区党委任命刘汝贤为中共徐州市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祖岳嵘、韩本初为副组长。其次，两派代表在革委会中的数量和重要性也不对等。在46名“群众代表”中，“踢派”占据31席，“支派”只占15席。后来，这些“支派”代表被“淮海八·三一”称为“假支派”。²

“三·一”革委会成立后，积极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据一份“踢派”主办的群众小报宣称，在1968年3至7月间，全市共举办了7000多个“学

《正直而失——祖岳嵘回忆录》，第90页，新风出版社，2007年；《王涌泉的回忆》，1999年7月1日。此件由当地“文革”亲历者提供。祖岳嵘是68军副参谋长，第二批“支左”人员中的骨干成员。王涌泉是68军政治部保卫处张，参加调查处理炸桥破路事件。

¹ 郑向玉申诉材料：《执行中央二六命令遭政治迫害》（初稿）。

² 《谁是革命三结合方针的捍卫者？——六论徐州两条路线的斗争》，《徐州红卫兵》，1968年9月5日；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9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习班”，约有20万人参加学习。到7月底为止，全市80%的单位已经成立了革委会，99.2%的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在“解放”干部方面，全市工矿企业基层领导干部达到70%，中层干部达到90%，局级干部达到50%。¹然而以下事实表明，实际情况与上述说法相去甚远。

3月9日，徐州市革委会和徐州警备区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群众组织将过去发放的武器一律上交封存。但是这项命令显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以至于市革委会不得不于7月份再次重申这项命令。²

3月18日，当地发生“支派”群众围困、占领徐州卫戍区大院（即68军司令部大院）事件。迁延至4月7日，军方不得不动员“踢派”实施清理行动，将400多名“支派”赶出大院。³

4月12日，中央致电济南军区，责成68军首长从徐州两派中各选10名代表，组成徐州代表团赴京商讨“大联合”事宜。王效禹在传达中央命令时说，徐州代表团一共包含10名两派代表（即每派各选5名代表）。经过暗箱操作，5名被结合进“三·一”革委会的“支派”头头作为“支派”代表参加代表团。滞留南京的“支派”随即通过江苏省军管会向中央反映，王效禹指定的代表都是“假支派”，只有“淮海八·三一”才是真正的“支派”。随后，中央致电南京军区，通知“淮海八·三一”选派10人参加代表团。⁴

5月26日，周恩来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含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接见两大军区代表、徐州驻军代表和徐州两派代表，试图对徐州问题做个了断。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济南军区负责人王效禹、杨得志，68军军长张铨秀、政委李布德，徐州军分区司令员柴荣生等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没有到会，由江苏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负责人梁辑卿代表。会谈中不但两派群众代表争执不休，军方人员也相互指责，根本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江青提出由中央出面办学习班的动议。周恩来表示同意。⁵迁延至7月上旬，包括徐

¹ 《谁是革命三结合方针的捍卫者？——六论徐州两条路线的斗争》，《徐州红卫兵》，1968年9月5日。

² 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9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³ 《右倾翻案风在各地的表现》，《红色火车头》，1968年5月1日。

⁴ 《穆正身在“徐海班”大会上的发言》；祖岳嵘：《正直而失——祖岳嵘回忆录》，第96—98页，新风出版社，2007年。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编：《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第39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⁵ 《穆正身在“徐海班”的发言》；祖岳嵘：《正直而失——祖岳嵘回忆录》，第96—98页，新风出版社，2007年。

州市军队和地方代表在内的“徐海班”正式开办。中央直接出面处理徐州问题，实际上意味着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失败。不过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在公开谈话中继续持肯定和保护王效禹的立场。

“徐海班”和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

中央高层直接出面处理徐州问题，并没有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除了突出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等抽象原则之外，中央高层似乎也没有什么具体办法。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中央高层一直希望各方能够通过“斗私批修”、互谅互让达成“大联合”协议。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1968年7月上中旬，徐州、连云港两市和徐州专区下属八县2000多名军队和地方代表陆续来到北京，参加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的“徐海班”。较早到达的徐州“踢派”代表杨正祥等人，因拒绝承认“淮海八·三一”代表的合法性，一怒冲出学习班。与“踢派”联合的“支派”头头朱成明等人也随之而去。他们一部分人乘火车返回徐州，另一部分人去找中央告状。当天，周恩来通过他的联络员指示：“冲出学习班是不对的。可以留下来参加学习，学习主席思想，斗私批修。”¹但这个指示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随后中央陆续发出“七·三”和“七·二四”布告，也对徐州派性斗争影响不大。据“支派”报刊披露，从7月10日到8月5日，“踢派”代表在学习班里挑起武斗18起，打伤一些“支左”人员和“支派”代表。²7月24日，杨正祥在徐州工人文化宫召集“踢派”头头会议，研究如何与“支派”斗争。³徐州“踢派”报刊还发起一轮强劲宣传攻势，揭发批判“淮海八·三一”的反军活动，否认他们是正宗“支派”。⁴“踢派”的上述活动均得到王效禹的暗中支持。⁵

8月1日，中央安排“徐海班”全体成员参加“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以

¹ 一位“徐海班”参加者的《徐海班笔记》，1968年8月5日。

² 《假检查，真反扑——二评王效禹六月一日检查》，连云港市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主办之《一月风暴》，1968年9月17日。

³ 张连生《文革笔记》，1968年7月24日。张连生是徐州丰县造反派头头，全程参加“徐海班”学习。

⁴ 《“拥军派”的庐山真面目》，《徐州红卫兵》，1968年7月25日；《究竟谁“拥军”？谁“反军”——徐州踢、支两派对待人民解放军两种不同态度》，《红色火车头》，1968年7月27日；《谁代表斗争大方向？》，《徐州红卫兵》，1968年7月31日；《“淮海八三一”决不能代表徐州支派》，《看，“淮海八三一”一小撮土匪的新罪行》，《徐州红卫兵》，1968年8月5日；《在“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之后——再看“淮海八三一”中一小撮土匪的新罪行》，《徐州红卫兵》，1968年8月10日。

⁵ 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新浪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c2160e0101j194.html，2014年12月15日登录。

示关怀。8月5日，“徐海班”领导小组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领导小组还对杨正祥和“假支派”作出批评，要求他们作出检讨。¹不过笔者手头两份不同的“徐海班”日记中，没有“踢派”做检讨的记载。

9月上旬，连云港两派代表签订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措施。这是“徐海班”开办两个多月以来的一个重要进展，“徐海班”为此郑重其事地召开了庆祝大会。9月2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接见驻徐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做促进“大联合”工作。毛泽东的指示是：“徐海地区对七·三、七·二四布告落实不够”；“徐海地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联合起来”；“徐海已经翻了两个个儿了，不要再翻个儿。”²5天后，徐州市、徐州专区下属八县和徐州煤炭系统两派群众组织也宣布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向中央报喜。然而此举只是一种表示服从中央的政治姿态，双方并未实现真正的联合。

10月7日，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代表中央接见68军干部，杨得志陪同接见。在这次接见中，黄永胜、吴法宪先是一般性地询问了徐州派性斗争情况，传达了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呼吁各派尽早实现“大联合”。随后，他们做出了如下指示：（1）要求两派不要纠缠于王效禹问题，不要听小道消息，不要挑拨江苏、山东关系。黄永胜指出“打倒王效禹”的口号是错误的。（2）强调“八·三一”事件和炸桥破路事件都是少数坏人搞的，多数群众没有参加。吴法宪肯定“淮海八·三一”是真正的“支派”。（3）宣布中央对徐海地区部队“支左”分工如下：①徐州市由68军负责统一领导，组织驻徐部队进行；②徐州专区以军分区为主，68军工作组织积极协助；③徐煤系统以坦克2师为主；④连云港以连云港市“支左指挥部”为主，18师及人武部积极协助；⑤八县由68军“支左”小组及各县人武部负责。各师及工区加强领导。³这次接见没有产生很大效果，首先是因为上述军队“支左”分工依然不够明确，存在多头并存、相互牵扯的问题。其次，中央“和稀泥”的态度遭到两派抵制。

¹ 一位“徐海班”参加者的《徐海班笔记》，1968年8月5日。

² 一位“徐海班”参加者的《徐海班笔记》，1968年9月26日。张连生《文革笔记》，1968年9月26日。

³ 一位“徐海班”参加者的《徐海班笔记》，1968年10月8日和9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高层希望在各个学习班掀起一个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狠批刘少奇各种罪行的高潮，推动各地的“大联合”进程。为此，“徐海班”分别于11月6日、8日、16日和29日召集不同规模和层次的会议。但收效依然不大。于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央又采取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决定将徐州铁路、煤炭、电业三大系统代表从“徐海班”抽出去，分别由铁道部军管会、煤炭部军管会、水电部军管会单独开班学习班，由三个部军管会主任亲自挂帅。这样“徐海班”实际上一分为四，每个班规模更小，更易于控制。第二，由铁道部派干部和“毛泽东号”机车组一起进驻徐州铁路分局，帮助分局开展工作，切实阻断“火车头总部”及其头头杨正祥与地方造反派的联系。第三，向“徐海班”派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学习班成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查比看”等活动。第四，由“徐海班”成员组成“徐州代表团回徐汇报团”，返回徐州宣传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促进当地两派群众“大联合”。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促成“徐海班”内的大联合，也没有终止徐州当地此伏彼起的派性冲突。1969年4月底5月初，“徐海班”再次发生两派代表大批出走事件，再次证明上述措施的失败。¹

徐州问题的真正转机出现在中共“九大”之后。5月初，参加“九大”的山东省代表团被留在北京办学习班，王效禹成为批判斗争对象。毛泽东接见了山东省学习班成员，对解决山东问题作了指示，支持对王效禹的批判斗争。²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徐海班”的“大联合”工作举步维艰，徐州当地派性冲突持续不断，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高层对王效禹的暧昧态度。现在王效禹受到批判，徐州“踢派”和支持“踢派”的“支左”人员便失去了靠山，也失去了争持的理由。

5月26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汪东兴、邱会作、李作鹏、李先念代表中央接见“徐海班”，陪同接见的还有王效禹、杨德志等济南部队干部。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王效禹的公开亮相会。他和山东省造反派头头杨保华向两派代表做了检查，表示要与徐州问题彻底脱钩。多位中央首长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徐州“踢派”的武斗倾向和“反军”言论。³此后一个多月，中央领导又多次召集“徐海班”军队干部会议和党员代表会议，借助军

¹ 详见张连生和另一位“徐海班”参加者1968年12月至1969年4月笔记内容。

² 中共山东省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³ 张连生《文革笔记》，1969年5月26日。张连生访谈，2014年10月19日，徐州。

队纪律和党内纪律贯彻中央的意图。经过各方努力，出走的“徐海班”成员大部分返回，学习班的活动趋于正常。

7月初，中央作出决定：徐海地区“三支两军”工作统一由68军党委领导，所有驻徐部队均要服从68军指挥。这是克服军队内部派性对抗的一个重要举措。7月29日，“徐海班”召集全体会议，由李布德传达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文件（中发〔69〕26号文件）。该文件不但要求稳定山东局势，而且要求肃清王效禹在徐州地区的影响。¹

为了促成有关各方尽快达成妥协，周恩来指示68军党委做一个象征性的检查。7月27日，68军党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承认68军党委“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部队建设都造成了很大损失”，并提出以下几条改进措施：（1）坚决贯彻执行“九大”精神，对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2）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正确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3）根据中央提出的“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照平等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进行改组”的原则，把一派掌权的市、县革委会改组好。（4）大力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5）加强党委集中统一领导。（6）遵照中央指示，立即整顿和健全“支左”办事机构，统一管理徐海地区“三支”“两军”工作。²该报告还附加一份《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提出革委会的成分构成和具体人选。³7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68军报告作出肯定性批复。毛泽东批示“照办”。⁴随后，这份报告作为中共中央1969年45号文件转发全国各地。

在做出上述铺垫之后，周恩来、李作鹏、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中央首长于7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海班”全体成员。李作鹏宣读中央对68军党委报告的批示。其他领导人对徐州两派头头恩威并施，一方面作出严厉批评，一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被公开点名的两派头头包括栾昌善（“踢派”）、徐峰（“踢

¹ 详见张连生和另一位“徐海班”参加者笔记1969年7月份内容。中共中央1969年26号文件具体内容，参见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²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9〕45号，第5—12页。

³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9〕45号，第14—28页。

⁴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9〕45号，第1—3页。

派”）、孔庆荣（“支派”）、朱林（“支派”）等人。¹当夜，“徐海班”成员陆续乘火车返回各市县，持续一年零两周的“徐海班”宣告结束。

1969年8月1日，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宣告成立，俗称“八·一”革委会。按照68军提交中央的改组方案，革委会由8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干部代表13人，占15.3%（暂缺9人）；军队代表20人，占25.5%（暂缺1人）；革命群众代表48人，占56.5%（暂缺两派以外的革命群众代表3人）；留给脱钩单位名额4名，占4.7%。革委会常委由27人组成，其中革命干部代表4人（暂缺1人），军队代表9人，革命群众代表14人。在7名正副主任中，张铨秀（68军军长）任主任，吴怀才（68军副军长）、刘汝贤（68军副政委）、韩本初（原徐州市委书记）、夏云芝（“革命干部”）、栾昌善（踢派）、孔庆荣（支派）任副主任。与此同时，张铨秀被任命为核心组组长。表面看来，新的徐州市革委会为了照顾各方的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三·一”革委会的人员构成，并容纳两派“群众代表”40多人。但实际上，是在王效禹干预期间受到压制的“支左”人员重新掌握权力（而在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委会，杨得志、袁升平取代王效禹成为实权人物）。

“八·一”革委会成立后不久，张铨秀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吴怀才接任68军军长。在随后的“整党”运动中，李布德在68军党代会上落选，调任山西省军区政委（实际上是被赶出68军），同情“支派”的军政治部主任田波升任68军政委。结果，在持续数年的“整党”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支持“踢派”的68军副参谋长祖岳嵘等3名正师级干部和100多名团以上干部，分别被送进68军和济南军区办的“学习班”，遭到关押、批斗、审查、撤职，1名保卫科长被迫害致死。空29师师长郭子谭受到吴法宪保护，在“徐海班”开办期间调离徐州，逃过这次整肃。而许多支持“支派”的军队干部则得到提拔、重用。刘显模由徐州军分区副政委升任政委，吕文俊由68军司令部处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²

在当地两派群众组织中，“踢派”和所谓“假支派”头头悉数在“清队”和

¹ 张连生《文革笔记》，1969年7月30日和31日。

² 祖岳嵘：《“文革”中的68军》，《正直而失——祖岳嵘回忆录》，第86—111页，新风出版社，2007年；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新浪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c2160e0101j194.html，2014年12月15日登录。

“清查五·一六”期间遭到清洗，杨正祥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徐峰、杨卫东等人被迫害致死。¹“淮海八·三一”主要头头田超、吴方新、马吉昌、张晓阳等人因涉及炸桥破路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八·一”革委会，但对他们的调查处理最后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由中央出面直接出面处理徐州问题，非但没有很快取得圆满成功，反而引发了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激烈派性斗争。中央高层一再强调徐州问题不能再“翻个”了，希望各方能够联合起来。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在坚持一派掌权和残酷打压政治对手方面，“八·一”革委会较之王效禹掌权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69年夏天到1973年底的相对稳定局势，依然是军方“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结果。所谓“大联合”，不过是掌权者们借助舆论宣传编造的一个美丽神话。

几点结论

纵观徐州“文革”运动的上述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不管当地派性斗争格局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是，地方权力始终控制在当地驻军手中。军队在“文革”期间始终扮演着中央控制地方局势的代理人。归根结底，军队最初与一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源于双方“控制”与“反控制”的诉求。这些事实是对“文革”运动系“大民主说”的一个有力反驳。

其次，这项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军队内部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事实表明，作为一个个特定的个体，军队人员（甚至包括68军党委主要成员张铨秀、李布德、吴怀才、郑统一、刘汝贤、祖岳嵘等人，济南军区负责人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等人，以及南京军区负责人许世友等人）的抉择和行动过程，与我们熟知的群众组织头头或者地方老干部群体的情况似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个人的抉择和行动，归根结底不得不屈从于反复无常的政治潮汐变化。这说明在当时宏观政治背景下，军队内部的派性冲突与地方上的派性冲突具有同构性和同质性。

第三，本文所叙述的派性对抗与冲突，归根结底源于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模糊

¹ 祖岳嵘：《“文革”中的68军》，《正直而失——祖岳嵘回忆录》，第86—111页，新风出版社，2007年。

性特点。例如1967年初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源于“夺权”前后公开的舆论宣传（大民主）和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控制）之间的巨大反差；而1967年7月以后军队内部的分裂，则源于中央政策的剧烈变化。更容易引起歧义的是，当中央出台新政策（如“军委十条命令”）的时候，并没有人对旧政策（如“军委八条命令”）做出公开检讨，反而强词夺理，通过主流媒体大造舆论，竭力强调两个政策都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中央政策的模糊性先是导致人们在进行抉择时莫衷一是，因而造成内部的分裂；继而在派性分化已然出现的情况下，又给对立双方提供了各行其是、强化对抗的合法性依据。从这个意义上，中央应该在地方派性冲突问题上承担主要责任。把王效禹等人作为替罪羊抛出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归结于个人品行和政治野心，不过是中央高层为了掩饰政治决策错误、维护“一贯正确”形象的一种政治伎俩。

第四，本文叙述的主要内容，是徐州驻军和群众组织之间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派性斗争。中央高层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化解地方派性斗争、早日实现两派的“大联合”。他们似乎始终不明白，这样的派性和派性冲突其实是集权主义政治的必然产物。想当初，在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不同意见后，毛泽东说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必欲置刘少奇等人于死地而后快。这与地方两派斗争最终只能以“一派掌权”收场，在性质上和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访谈】

留学中国：一个奇怪而矛盾的国度

——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口述

杨东晓 采访撰写

时间：2013年1月

地点：清华大学

记录方式：录音整理及笔记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北欧，只有两种人因为对中国感兴趣，开始琢磨着学中文。一种人是受1968年法国革命和学潮的影响，同时又对自己的社会不满，想寻找另一个类型的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社会。再加上看到了苏联出现的种种问题，认为苏联搞的社会主义不行了，是假的，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官方的宣传很成功，对西方的年轻人有很多积极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兴趣而学了中文。另一种人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兴趣。他们热爱唐诗，喜欢哲学和禅宗，尊崇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

我属于后一种。通过看译成英、德、瑞典等文字的书籍，和来自嬉皮士的文化，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点了解。我最喜欢的是唐朝寒山子的诗，比如说他这一首：“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联溪难记曲，叠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当时我还特别欣赏慧能，买了一本英文的《六祖坛经》当小说看。其实九十年代美国电影《心灵捕手》里的麦特·戴蒙，他就是慧能，如今很少有年青人明白这一点。

高中毕业后，我先去了地中海的农村参加了不到半年的义务劳动，摘葡萄、柚子、柠檬等，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一下大千世界。回家后就下定决心学中文，不过我那时对中国现实社会并不了解，就是看《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对外文委的宣传。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还给他们写过信，并收到这个电台寄来的一些宣传资料，我印象里还包括一枚毛主席像章。

我们那一代瑞典人上大学多是出于兴趣，反正高等教育是免费的，不太考虑

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汉语在当时的瑞典没有多少“市场”上的用处，我母亲担心儿子以后找不到工作，父亲倒认为，儿子对什么感兴趣就让他学什么呗。

在1975年来中国之前，我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各种资讯，包括中共“九大”的报道，都显示出“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即文革已经结束了。

其实，所谓“文革”不过是对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某一部分的简称，即不能说凡是在那十年当中发生的都有“文革”的属性。从今天回望，我是文革期间在中国学的中文，但是，当时我们并没觉得有一个文革正在进行，也没觉得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之中。我们这些学生觉得中国就是那样。从中国官方媒体和西方媒体上来看，1969年红卫兵运动已结束了。关于文革的报道在瑞典文中用的是过去式。

后来我研究文革史，从搜集到的1966年至1970年代初的资料上看，1966年文革开始时，“闹革命”的大学生需要一些活动经费，买一些墨水、稿纸、布，虽然都是少量的钱，但都有指定的搞文革的经费，都是官方拨款给学生组织。但在“九大”胜利闭幕后不久就不再拨款，这个款划归到别的地方。当年的财务报表也能从侧面显示，这场运动好像已经结束了。

1972年，我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中文时，认为学到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西，没有特别地觉得是文革的东西。当时学中文的学生少得可怜，瑞典只有斯德哥尔摩大学有中文教学，20来名学中文的新生，过一个学期减少10个，再过一个学期再减少一半。到了最后只剩下3名学生，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了学士学位。当时整个瑞典会中文的没几个人，因为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瑞典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和与匈牙利、捷克相当。瑞典出口中国的就是纸，当时中国印红宝书最好的纸，都出自瑞典或者芬兰。瑞典从中国进口暖壶、布鞋等用品。

在斯德哥尔摩能说汉语的地方很少，不多的几家中国餐馆，多是福建人、浙江人、广东人开的，他们的口音太重，根本无法交流。整个斯德哥尔摩只有两名中国学生，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所贵族中学里。

我毕业以后，希望到中国来进修。但是，在1970年代初，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每年来中国旅行的人数定额不过是1000余人。1972年，中国开放了对欧洲国家的交换留学。我1975年想申请奖学金到中国进修汉语，可瑞典只有两

个名额。我当时不是瑞典籍，是西德国籍，而西德有16个名额。我们系的马悦然教授给他在西德的一位汉学家朋友写了信，我才得以用西德籍参加考试并考到中国来。谁说只有中国讲“关系”？德文里早就有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维生素B”的说法（“B”是Beziehungen的缩写，意思就是“关系”），而英文里同样有所谓必备“维生素C”（“C”就是connections的缩写，意思也是“关系”）！当年如果没有关系，我不可能有机会参加那次考试！

我来到中国时，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虽然感到中国的一切很陌生而奇怪，但还是能接受的。我想，大概中国就是这样的。

到达北京，正是农业学大寨、“评《水浒》”的时候。在北京语言学院待了一个月，我马上觉得北京的外国人太多了，至少有100多人，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学习汉语。我们有4名留学生选择到上海，我要学中国文学，于是被分到复旦大学，就读中文系，学习现代文学专业。

我到上海时是1975年10月27日，当时复旦只有十几个留学生。我们住的是现在已经拆除的四号楼，我的同屋是两位中国男生，其中一位是江西井冈山来的，姓刘，另一位来自贵州，叫莫贵阳。36年后的2011年，“小莫”在一个电子刊物上回顾了我們三个人的同室岁月：

当时，复旦中文系有十来个外国留学生，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应这些外国留学生的要求，系里安排一些同学与留学生同吃同住，表面上是为方便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为他们提供语言环境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而我们在入住前的培训中同时还接到口头“指示”，要监视这些“老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破坏活动”。每两个中国同学陪一个外国同学吃住在一块。在四号楼朝南一侧开辟了留学生宿舍专区。男生住二楼，女生住三楼。比起一般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的条件相对好一点儿，为防蚊虫叮咬，门窗都装了纱窗，灯光也明亮了许多，冬天还供暖。我陪住的是一个瑞典同学，中文名字叫沈迈克。（出处：<http://www.scimao.com/read/1241672>）

进了复旦大学以后，我慢慢地发现中国高等教育有些奇怪的地方。在瑞典，对于学生提的问题，老师会毫无保留地回答。首先他会说自己的看法，第二他不

会代表国家或政府。总之，老师跟学生交换意见是没有顾虑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汽车拉我们去看了一场名为《沙漠的春天》的电影。我们留学生普遍认为这部电影很糟糕，简直傻透了。回学校的途中，我在校车后排找到了老师，想跟他交流交流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说：“老师，您得承认，今天这部电影真不怎么样，不好”。老师跟我说了半天这部电影怎么怎么好：“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按照1957年对六种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来判断，这部电影好极了。经过文革的锻炼，特别是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中国电影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性第一位、艺术性第二位把握得很好。”虽然他的逻辑我能听懂，但我当时还年轻，我还在想，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就不能说实话吗？但是老师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我对老师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太了解，对他们还抱有幻想，不过此类“幻想”大概就是当时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反正给我们上政治课的老师一再强调没有什么共同“人性”，只有阶级性；而我们留学生呢，肯定满脑子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中毒很深啊。后来，就觉得中国这地方，如果人人都是这样，我还来中国干嘛呀！在中国并没有学到什么现代文学。

比较起来，复旦大学图书馆还算不错的，比起留在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书籍，不过都不是在课堂里，而是自己在“自学”中发现的。比如说文革前的一些中国作家的主要作品，还是可以借到的。我曾经借过一本浩然1960年出的《新春曲》，在这本书的衬页上，发现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们：

为了把图书馆工作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艺阵地，读好书，批坏书，提高大家识别能力，希望阅完此书后，能积极来稿，配合我馆共同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稿件请交工作人员）

此致

革命敬礼

图书馆开架库

1970年11月26日

总的来说，我觉得浩然的著作还行。当时你在海外根本找不到他文革前的著作。我记得，我还把非常难得的一本300多页的《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1974年4月江苏溧水印刷厂印）从上海随身带到北京瑞典大使馆，在文化处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它全部复印下来，该副本现在仍然藏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图书馆。

1975年冬天，上海的学习生活变得苦闷起来，“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得越来越厉害，“批邓的烈火越烧越旺”。我们12位同学常常在一起发牢骚：既然天天学这些东西，既然人人都是这样，我们干嘛还在中国上学呀？有的同学想改学日文。1975年，我们回北京过圣诞。在火车上同学们说，这样学中文很不舒服，甚至怀疑自己来到这个怪地方，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后来，我们都决定继续留在中国，但是动机已经与初来时不一样了。比如我，我就改变了。我决定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观察这个奇怪的国家 and 现实社会，它是怎样的制度？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看看它到底能奇怪到何种程度，它的奇怪有没有极点？这个国家与瑞典完全不一样。

我最讨厌的是上政治课。有一次，为了逃政治课，我把自己锁到四号楼的男厕所里，可是老师还是用钥匙开了门，把我找过去上课。后来，我为了逃政治课就干脆骑车上街。1976年春天，我骑车从五角场向南，能骑到淮海路去喝酸奶。从复旦往北几百米，就有一个牌子，那里是外国人的禁区。

政治课上的逻辑完全不通。我们在课堂上学习批判修正主义，辞典上修正主义的解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改。我们要批判的是苏联对马列主义的修正。但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的居然还有宋江、孔老二。宋江和孔老二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关系？把孔夫子和农民起义的头领方腊也拉出来，放在一起批。他们与修正主义有什么内在逻辑？老师是不跟我们讲逻辑的。

有一次，政治课上要求我们批电影《武训传》。有位看过毛泽东的书，又在

香港学过中文的，中文水平高的同学，中文名字叫叶世春。《记忆》曾经发表过中国同学批评他的大字报。叶世春呢，胆子大，敢以毒攻毒。他向老师提出：我



们这些同学谁都没看过这部电影，而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看了电影再批。老师马上驳他这种反动谬论，指出这条语录在今天不能用，因为毛主席也说过这个电影是坏的，它就是糟得很，同学们要相信毛主席。

（上图：复旦大学批邓的游行队伍）因此，这个电影不看也可以批判。尽管我们提出了，还是不能看。课堂上天天如此，这就是中国。我哪里知道，伟大领袖准备于9月份去见马克思。那时我以为，就是他老人家走了以后，中国也还会这样荒唐下去。

1976年，中国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用当时校园喇叭广播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十个春天”。在北京的留学生都抱怨，说校方不让他们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让他们游行。我们复旦恰恰相反，留学生必须参加大会，到四月份校方动员学生上街参加游行队伍，从复旦走到外滩革委会，为了表示我们支持两项英明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让华国锋任总理的那个违反宪法的决议（游行完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去了四川路上的德大西餐馆，边吃边总结经验）。

复旦大学一定要我们参加批邓，是希望我们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要知道它深刻的历史意义，它的革命内容，它的进步性，以及这次反击就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打倒邓小平的经济挂帅。但我们旧的阶级烙印是如此之深，觉悟是如此之低，谁都看不出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种种阴谋！我们反而觉得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发展国民经济有些道理。难道8亿人民都反对邓小平？难道8亿人民都不希望发展国民经济？4月份，学校开了个大会，我们被校方要求举起拳头“打倒邓小平”，动员我们游行是为了巩固批邓的成果。

看到这些事情，让我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我决定继续观察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

但是又不允许我们接触中国老百姓（现在叫“民众”，当年没这个词儿，它是后来从台湾转销过来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想法，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暴露出一点。这年春节后，我从一位在上海另一所大学的非洲留学生那儿看到一盘邓丽君的盒式磁带，我此前没有听过邓丽君的歌，一听就觉得她的歌很好听，于是借了磁带回到复旦。当时宿舍里有我那两位同屋，还有另外一两个中国同学。我们听了一会儿邓丽君的歌曲，有一位同学说，这唱的什么呀？我听不懂，也不爱听。

当天晚上，我的同屋“小莫”悄悄问我，迈克，你那个音乐你再放放，批判也得先听了再批判（他这个态度很科学，我很赞成！）。我就教他戴上单耳的小耳机自己听，一会儿他听完一遍又叫我教他如何回放。半夜一点多我醒来，看到他正在一句一句地听写歌词。第二天早上，他叫了最好的一位朋友来听。没想到，这件事竟然酿成了一个事件：不知道他被人揭发了，还是哼了歌曲被别人听到。

总之听邓丽君磁带还成了一个事件。他告诉我，他不想再听了，他也不喜欢听这些，并且不许我再播放。我说你不是喜欢听吗？他说不喜欢。他们班里的中国同学都传说他“出了事”。5年后我们又见面时，我问起他这件事，他说为此事还写了检查。



这小小的一件事，是在（上图：复旦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参加批邓游行）

短短的三四天内发生的，它表明在中国还是有正常人的，“小莫”也能是个正常的人，他能理解歌声里的爱情，而平时，他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这件事让我觉得，一方面是很正常的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跟我们一样；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凡是在表面上的，当局让我们看到的，又与他们完全不同。

在当年的留学生中，也有人真心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就是好，而且至今认为当时的中国就是好。前两年我们几个人在加拿大重新见面时，我说你别骗现在的年轻人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中国，只知道学校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很片面的局部。现在我们可以采访文革中的当事人，复旦大学搞文革研究的，看当时保存下来的工作笔记，了解当时是怎么回事。

如果觉得文革中的那些荒唐事很好玩，我们只能说那是自己当年个人的一些感觉，但不能说当年的中国人也乐在其中，因为我们看不到、摸不着，我们与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处境。中国人生活在那样处境中，就不好玩了。

1975年12月份，校方给我们安排了十天的“学工”。学校和我们所在的中国纺织机械厂的领导让我们看到的上海工人所谓“典型”的生活，其实是骗人的。他们带我们去参观工人的家，家中居然有电视机，不言而喻，这是怎么回事。没准我们刚刚离开他家，电视就被搬走了。虽然在外国可以看到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报道，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些信息靠不住，不太相信港台的报道。现在看来，所报道的东西未必统统都是假的。

我于1976年7月28日早晨，坐火车离开中国。火车在大地的震动中开出北京站，我是在中国大地震后第一位回到瑞典的人。

1977年、1978年我在回到瑞典之后，还在远距离地观察中国，感觉中国正在变化。但是能变多少还不知道。首先大家都很肯定地说，刘少奇是不可能平反的。后来慢慢感觉到，邓小平有可能会让一些人出来，谁会出来呢？1979年，我们这些先后在中国留过学的七八位同学们喜欢在一起讨论这样的问题。1979年初，我给瑞典一家汽车公司当翻译，接待中国的一个军方代表团。我问一个代表：彭真、杨尚昆能不能复出？那个军人针对杨尚昆回答说：“不可能，叛徒啊”。他的态度很干脆。“叛徒啊”，就定性了。结果没过几个月杨尚昆就复出了。

当时有一位朋友，中文名字叫罗思，他在1966年、1967年曾在中国做过外国专家，比我大10岁。他站得高看得远，我问他中国的未来将会怎样。他说你等着，会全盘翻过来。他上下挥动臂膀，将两只手翻转做了个手势。■

【要有光】

父亲“畏罪自杀”

胡杰 版画



A/P 要有光之十一 胡杰 2014

插图四：张凤清和姐姐睡在炕上，眼睛睁开，就看见父亲吊死在房梁上。她才七岁。父亲吊死的原因，是他给饥饿的几个娃娃偷了些队里的豆子，队里要开他的批斗会。他就“畏罪自杀”了。■

【要有光】

姑侄五人皆逃荒

依 娃

张凤清、张代清为亲姐妹。张千虎、张缠虎、张玉兰为亲姐弟。他们五个人都姓张，是一家人。前两位为堂姑，后三位为堂侄。他们五个人都是从甘肃逃荒落户到陕西的逃荒者，其中三位当时年纪仅仅十多岁。2012年8月，我去甘肃省天水市采访了77岁的张忠信老人，了解到一个地主家庭在土改、大跃进中的悲惨遭遇。他说他二哥的女儿张玉兰被送到陕西，换回来二十斤包谷；二哥的儿子张千虎、张缠虎两个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娃娃，自己离家逃荒去了陕西。他五叔被逼上吊，五婶跳崖，两个堂妹张凤清、张代清也先后逃荒落户到陕西。

回美国后，张忠信老人一家的遭遇一直让我隐隐作痛，时时想起。一年多来，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找到这位老人逃荒到陕西的两个堂妹，两个侄子，一个侄女。虽然他们的经历张忠信老人都说过了，也给我提供几页口述材料，但是，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和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慢慢的询问，听他们慢慢的叙说，听他们从各自不同当年的宣传的角度讲述一个家庭五口人的逃荒经历。但是，张家五个人分布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而且多在乡下，比较不好找到。强烈的想了解他们逃荒经历的更多细节的心情，驱使我脚踩泥泞东奔西跑，先后去了渭南市、渭南郊区、眉县、周至县，拜访了年已六七十岁的张家姑侄五人。找到了张忠信老人饥荒年间逃荒到陕西的亲人们，他们有些给儿女看孩子，守家院，帮助下一代做生意，养几头猪挣些零用钱，忙忙碌碌……但是，五十多年了，张家五个人并没有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逃荒往事。

一、我儿子的名字叫“秦安”

受访人：张凤清，女，62岁，陕西省渭南市人。逃荒前为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张家寨子人。

时间：2013年8月28日

录音长度：49分钟。

采访地点：陕西省渭南市西岳花园张凤清家。

大饥荒饿亡者：张武奎，男，40多岁，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张家寨子人，因为偷豆子被发现，上吊而死。石岁娃，女，40多岁，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张家寨子人，因为害怕队长开批斗，跳悬崖摔坏腿，死亡。张小清，女，两三岁，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张家寨子人，饿亡。

前记：和张凤清打电话联系好，细雨蒙蒙中，我驱车前往渭南。虽然老家富平属于渭南地区管，我还是第一次去距离五六十里路的渭南。在一条马路的街边，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微胖的张凤清在等我，还见到了他的儿子李秦安，小孙子丑丑，还有他的丈夫。秦安是甘肃省的一个县城名，是张凤清的老家。

依：姨，你三哥让我来看看你，聊一聊。

张：我小的时候没有人管，没有上过学。那时候别人说过啥，我都记不住了。

依：你叫什么名字？

张：张凤清。我还有个姐姐在这里，叫个张代清。

依：你今年多大了？

张：我今年六十二了。我不到十岁就没有妈了。

依：你老家在哪里？

张：秦安县魏店公社张家寨子，距离魏店街道不远。

依：你记得以前的事情吗？你记得你的父母吗？

张：父母我隐隐约约能记得一些。我记得我妈个子高，人瘦一点。

依：你妈叫什么？

张：不知道。

依：你爸爸叫什么？

张：也不知道（注：2012年8月，我去甘肃省天水市采访过张凤清的堂哥张忠信，记录下她的父亲叫张武奎，母亲叫石岁娃）。我是家里的老小，我们姊妹四个。我那时候六七岁，记得不清楚。

依：你为什么那么小就没有父母了？

张：我们那个时候成分不好，是地主家庭。我爸在兄弟里面排行老五，他那

时候还戴着地主的帽子。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你戴上地主帽子、反革命帽子、四类分子帽子。就是这么个。你应该知道嘛，那些年，毛主席在的时候，不是经常斗争四类分子嘛。那时候游行哩，批斗哩，就是这么个。我爸就是地主戴着帽子。我家穷得很。

依：地主家应该有钱嘛！

张：到我爸手里有什么钱？我爸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哥什么都知道。我哥在兰州，叫个张忠勇。

依：吃大食堂你记得吗？

张：吃食堂我记得一点点，给的就是稀汤汤。没有馍。我听人家说，村里有两个媳妇子，在地里锄头地哩，她们两和队长关系好，就对队长说，我妈说了队长什么坏话。给队长一说，队长知道了，就叫人下午不要上工了。那时我爸还在外面干活去了，不在家。那天队长叫我妈，说要拉到村子里批斗去。斗我妈，说我妈说了他的坏话。队长叫人都开会去。我们住的地方在半山上，咱那地方都是山，上面就住了我们一家子，在半山上，下面还住了几家子。队长就喊叫着让到大村里开会去。开会往下走有沟坝，那个沟还很深。队长说到村里去，批斗我妈去。我妈走到半路上，那里有个崖，就从崖上跳下去。结果会也没有开成。

依：你妈为什么跳？

张：我妈就气要开会批斗她，我妈害怕丢人，受不了，就从崖上跳下去。我还记得，我妈从高崖上跳下去，有几个人把她抬回来，就把大腿、小腿骨头都摔断了。那时候，没有医生，如果现在，腿摔坏了，能给看好。我看我妈大腿都烂了，血赤赤的。那时候家里我哥在秦安上学，上高中。最后我爸回来了，回来时间不长，我妈就死了。

依：你妈死的时候你看见了没有？

张：我知道，我在。

依：你妈怎么打发的（土语：埋葬）？你记得吗？

张：我记得来了几个人，还有棺材。咱那里埋人，还敲锣哩，我都能记得，有人敲锣，就把我妈给埋了。

依：爸爸呢？张：嗯……最后……。（注：张难过得哭起来，再听录音的时候，我的眼泪也流下来，很自责，为什么要揭别人的伤疤？）

依：姨，不要伤心了，不要哭了，我知道是伤心的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哭了，咱们随便说一说。不要太过难过，以前是社会不好，给人定成分（为了安慰老人，我说了一大堆劝说的话）。

张：我的事情，我的娃都不知道。都没有给娃说过……

依：姨，你不要哭了，你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给张抹去眼泪）。我就是来看看你，别伤心，把过去的苦事情说一说，让我们年轻人知道一下。

张：我爸回来了，我妈就死了。那个病也看不了，山区到哪里看去，没有看成，我妈就走了。我妈死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妹子，刚刚会坐。反正刚会坐，还不会走路哩。一两岁的样子。我爸回来了，饿得没有啥吃。我们家庄子那边，是队里种的大豆，摘了些大豆回来，给我弄上吃，给我妹子吃。但是让谁给看见了，要给他开批斗会，要开批斗会。不知道开了没开，反正我爸那个晚上……。他睡到半夜里，他把他给吊死了（注：张痛哭起来）。

依：姨。你不要哭，不要哭，你一哭我难过得很。我们慢慢说，你千万不要太难过了。你记得你爸爸死是什么季节？

张：那时候，我记得天不太冷，也不太热。我爸熬煎得很，发愁得很，人家队长找过他，骂他偷豆子了，就说要开批斗会斗他。那个晚上，我和我二姐在炕上睡着哩，二姐比我大两岁，我们才几岁，瓜（注：呆傻的意思）得不知道啥，还睡觉着哩。我哥在另外一个房子睡觉，我爸和我们在这边睡。我哥起来得早，天刚麻麻亮就起来了。他起来一看，爸就在，哪时候不是盖的瓦房，有那个梁，我爸就吊在那个房梁上。

依：在哪个房子？在你们的房子吗？和你们同一个房子吗？

张：在我们的房子里，我和我二姐还睡觉着哩。

依：就是你在炕上睡，爸爸吊死在这个房子里？

张：嗯，早晨我哥起来了，推门进来，我哥喊得多大的声音，我哥也才十多岁，还是个娃。我听着我哥喊叫着：“大！大——！大——！”我哥赶紧跑出去叫我村里的一个人，那人和我们关系好，那个人就来了。来了把绳子割断，人下来已经都没有气了。人吊上去，几分钟就没有气了。

依：你都记得？

张：我那时候就是个六七岁。

依：你没有父母亲了怎么办？

张：那时候，我哥还在天水上学，我父母死了以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学了。就跑到兰州，那里可能在招工，就找到兰州那个炼油机械厂里。他在家里有个媳妇，他也不愿意要。是我妈以前硬给娶的。

依：你们几个小姑娘怎么办？

张：我大姐那时候已经嫁人了，我大姐嫁人了。家里就留下我、二姐、小妹子。我们几个过，没有人管，没有吃的，最后那个妹子也就死了，就死了。

依：那个娃娃有名字吗？

张：不知道有没有名字，没有人管（注：张忠信老人说这个小女娃叫张小清）。我嫂子也就是个十六岁，年轻，把我们几个成天狠劲的打。我六七岁的张凤清早晨睁开眼睛，看见父亲吊死在她面前。二姐受不了，就跑了，她一个人跑了。我二姐也就是个八岁，一个人跑到快到秦安县了，叫个金灯村还是什么，有一家子人，就把我二姐收留下。给人家当女儿，就由人家管着了。我二姐一走，我就没有人管了，我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最后，时间长了，我也跑了。我自己就跑了。

依：你自己跑，你那么小自己跑？

张：我就自己跑，我就顺着路跑，跑，我一个人跑。我一个人跑，跑。

依：没有亲戚管你吗？

张：那时候，没有人管你，地主成分，人躲避都躲避不及。有的亲戚情况好，人家也不管我们。最后我走，走，走到不知道什么地方……。走到那个村子，天黑了，就胡乱钻到那里一睡，就睡在人家家门口，有时候人家就把我叫到家里，人家看我可怜……。 （注：张难过得说不下去）

依：姨，不要哭，不要哭。那时候狼多得很呀？

张：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害怕，我就顺着那个山梁一直走，慢慢的跑，慢慢的跑。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最后我怎么给跑到秦安县？那一年，人都往外面跑，逃荒哩。秦安县把那些逃荒的人使劲挡哩。

依：为什么挡？

张：人家不让出去，不让外出逃荒，不让走。把人弄到收留站一收留，又送回老家，哪里的送回哪里。在秦安县的街道上，已经黑了，我坐在地上，过来了

个车。车上的人下来问我哩，我就给人家说了，那个人把我送到收留站去了。

依：他们问你什么？

张：问我的情况，我一说，就把我送到收留站，呆了好长时间。收留站里面还给你管饭哩，一进去你哪里来的，又送回哪里去。人家不让我出去，他们的意思是在收留站，还能吃上饭。我就在那里面呆，呆了好长时间，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们村子里的人往外面跑哩，结果那一个晚上让收留站的人收留来了，他们就问我这个那个。收留站的人也问我，看我是不是撒谎，还真的是没有父母亲了。我们村子里的人就说：“这女娃是我们村子里的娃，也没有爸也没有妈，哥和姐都逃出去了，就她一个人。你把娃送回去，还没有人管，让饿死去。”那一次，魏店来的就收留了几十个人，要往回送哩，把我也要往回送哩。那时天还没有亮，也没有车，都是往回走哩，哪里来的汽车？那时候还没有公路。走到天快亮了，我想我回去又没有人管，我不敢回去。天快亮了，我给送的人说：“我去上个厕所。”他说：“你去。”我上了个厕所就给跑脱了。

依：你还灵光，你不害怕？

张：我不害怕。我想你把我送回去，我还是没有地方去，没爸没妈。那些亲戚谁管你呢？人家自己管不了自己，谁管你呢？我又跑回去，跑到秦安县。那个晚上，我还在街道上睡着哩，人家又把我拉到收容站。

依：在收容站吃什么？

张：吃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能凑合吃饱，不那么饿了。咱那里不是高粱多，红高粱，吃高粱了，苞谷了，燕麦了。第二天早晨，又要把我送回去。我见了人家的领导还不好意思。

依：你一个小娃娃还知道不好意思？

张：人家感觉我咋天天在这里呢，怪得很。前两天把我送走了，我又跑回来了。我见了人家的领导，我就躲避开，人家撵我哩。人家问我：“你避开干什么？现在我们再不送你回去了，就把你放在这里面。”我说：“你把我送回去，还是没有人管。送我回去弄啥哩？”那个领导说：“现在不送了，秦安县有一批孤儿，国家收留下管。你就留下。”最后把那个收留站就改成孤儿院了，最后不知道收留了多少孤儿在里面。

依：有多少个孤儿？

张：我也小，多得很，我也不知道。那是个大院子，四合院子，四面都是房子，都收留满了。我记得有的小伙子，都多大了。

依：最小的娃娃多大了？

张：我还算比较大的，最小的娃娃有那刚刚会走路的，没有父母亲的娃娃。孤儿院管了有三四年，孤儿院又解散了。有的娃娃亲戚领回去了，没有人要的就送人了，最后国家把那个孤儿院撤销了。

依：后来怎么办？

张：我哥从兰州跑回来找我，我还能认得我哥。他在兰州找上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回来找我们姊妹们，把我二姐找到了，和我二姐的养父两个人来找我来了。我哥先找到我二姐哪里，到处打听，听人说秦安县有个孤儿院，就到孤儿院找一找。那时候孤儿院问我：“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姓李。”我给人家胡说，我不知道，就胡说了。我哥进到孤儿院问，我听到门口有人问：“你们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张凤清的没有？”人家那个人说：“有个李凤清，没有个张凤清。”我在院子里站着，脸一转，怎么是我哥！我跑过去就把我哥抱住，就喊：“哥！”

依：最后怎么办？

张：那时候，我哥领上我他也没有办法。他刚刚有工作，自己就能管自己。又过了好长时间了，我哥给我姐姐说，我姐姐就来看我。我哥哥又来看我，把我领出来，领到我姐姐那里。我大姐那时候在大川林场，就把我领到大姐那里，我就在大姐那里住了几年，由她养活着我，那时候，我姐情况也不好。到了六七年，还是六八年，我哥想办法把我的户口办到他那里，办到兰州。六八年，我也就是个十七岁。在那里住了一年多。那时候有一个国家的政策，让老知青下乡。不管是农村的、城市的，只要你是学生一毕业，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号召的。我的年龄刚够，十六岁到二十六岁都要下乡。人家又动员让我下乡，最后下到甘肃的庆阳地区，最后我大姐来到了这里，我就到这里来了（注：陕西省的渭南地区）。

依：你大姐是怎么来的？

张：我大姐以前没有在这里。她以前在甘肃，和那个男人过不成，离婚了，就跑出来到这里。她来的早，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注：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

大姐来陕西的时候，我的户口还在我大姐以前的家里。最后我下乡以后，我姐姐叫我到这里来，最后是我哥去那个男人家里把我的户口迁移过来的。

依：你是哪一年到陕西的？

张：到陕西，我记不住，我也就是个二十岁。我到我姐这里，我姐就给我找了这一家，就结了婚。过了几年，最后国家有个政策，下过乡的给工作，我就找到这里的知青办，就把下过乡的手续办了。安排了工作，就算是城市户口，不是农村户口。我在服装厂上班，做衣服，什么衣服都做。衣服、裤子都做。刚开始做一般的衣服，中山装。最后就是做外贸的、出口的衣服。

依：你工作的时候，敢不敢填写自己是地主成分？

张：我不会写字，谁供我念书呢？我没有上过学。在孤儿院上了一学期，连个信也不会写。

依：这个叔叔（注：张的丈夫）在哪里工作？

张：他原来在这里的郊区，没有工作，我姐姐以前认识他。咱从农村来，也瓜，不懂啥叫个自由恋爱。我姐姐非要让我成，这个人性格好着呢。就四十多年了。我的大儿子今年四十一，叫个宝安，李宝安。我的小儿子三十九，名字叫个秦安，李秦安。孩子他爸说：“你妈是甘肃秦安县人，就叫个秦安吧。”就是个纪念。

依：你再回去过秦安没有？

张：我和我大姐回去过一次。那是我爸和我妈死了五十周年，我去给老人上坟烧个纸。我大哥从兰州回来了，我三哥也回去了。我大姐现在在这里，我二姐在甘肃，我哥哥在兰州，我哥哥个子高，像我妈。我哥还是个先进模范，不光是单位的模范，是全省的，还会打篮球，拉二胡。我哥文化好，会说话，那时候成分不好，入党也没有入上，也苦恼得很。我们都联系着呢，有时候打个电话。我哥哥也经常来看我。

后记：张凤清没有文化，不认字，也不能写。她说话慢慢的，但是条理很清楚。下午，我们又去看望她的大姐张代清。她的儿子秦安不知道母亲的苦难，她的孙子丑丑就更知道了。■

【述 往】

土改工作队队长与地主女儿的婚姻

崔龙浩

我的爷爷，曾是东北松嫩平原上一名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而我的奶奶，就是爷爷进行土改的村里唯一一户地主家的女儿。他们的结合，并不是一场跨越门第之见的伟大爱情——事实上，这是一场传统的充满交易感的包办婚姻，同时也是对大历史的见证。写自己家的历史，最难的就是避免“罗曼化”的倾向和简单的是非判断，进而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毕竟，要一个人摆脱家庭的立场，是一件太难的事，而“快意恩仇”的诱惑又是那么强烈。对此，我也只能尽量为之。

一、 联姻：地主的自保

1947年初冬¹，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来到了吉林省伊通县南部的一个村庄，为首的工作队队长骑着大洋马，挎着两支驳壳枪，甚是威风。这支队伍就是伊通县大孤山区土改工作队，而骑在马上的人，就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除了本村唯一的大粮户²——他们早就知道了土改工作队要来的消息。这家人兄弟两个，老大当家，老二早逝，老娘尚在，有土地数十垧³，草房11间，小仓房三间（都是草坯房），一片柴火林，算有些家财。而我的奶奶，就是二爷家的小女儿。对于自家财富的来源，奶奶并不特别清楚，只知道在她爷爷那辈，家里就有不少土地了，后来在她大伯（东北称“大爷”）的经营下，日子过得挺富足。与许多大粮户一样，她家依附政治力量的痕迹也很明显——奶奶的父亲当过伪警察，大爷也在屯里负过责任，经常去乡公所办事。当然，她家并没有成为秦晖所

1此时间为笔者祖母回忆。据史料记载，1947年11月24日，时任伊通县县长孙明光签署布告，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停止佃农向地主交租。由于当时伊通北部、西北部临近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长春、四平，因此，当时县委、县政府决定首先在南部和中部几个区进行土地改革，组织百余人的工作队分赴各区村，组建农民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参见伊通县志编纂委员会：《伊通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页。据奶奶讲，爷爷所在的工作队虽不及百人，但也有好几十人。

2解放前东北农村地区对土地较多人家的称呼。——笔者注

3垧，民间土地计量单位，各地算法不同。在解放前的东北地区，一般一垧指15市亩，一市亩约合6.667公亩，一垧约合100公亩。奶奶回忆家里有五六十垧地，具体数字不记得了。

说的“政治性地主”——那种借助政治权威获取财富的地主。他们选择靠近政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从这一点上看，后来把奶奶嫁给爷爷，还是蛮符合“家风”的。

对于这家人来说，共产党并不陌生。伊通县城已于1947年10月1日解放，而在此之前，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在伊通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两年拉锯战¹。大爷与共产党多有接触，不仅很多亲戚朋友加入其队伍甚至入党，还与中共伊通县委主要领导邓烈²认识，曾冒险赶车送他去山沟里躲避国民党军队。回来路上他连人带车被国民党抓去拉了十多天活，家里人还以为出意外了。正是在此期间，恰巧国民党来收缴枪弹（兵荒马乱之际，当时东北许多有点财产的人家都有枪，她家有枪的消息不知道被谁暗报了国民党），把奶奶的母亲吊在房梁上逼问。在一家女人们的苦苦哀求下，我的这位太姥姥才侥幸免遭毒打，但被抓去做了十几天洗涮缝补的活，后被同村穷人保回。保太姥姥时，奶奶的四叔还被国民党士兵拿“苕簸疙瘩”（即扫把，东北方言）一顿好打。

但此一时彼一时，土改的声势已经笼罩了这一地区。当听说土改时大粮户们“又”要被吊在房梁上痛打甚至枪毙的消息后，大爷慌忙带着自己的大儿子逃往外地，留下老娘、奶奶的母亲带着奶奶和坐月子的大儿媳在家（其他家人或已出嫁，或在外地）。

随着土改工作队开进临近村庄，打杀的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一家子孤儿寡母，惶惶不可终日。察哈尔省委曾对土改前各阶层心态作过一个描述：“贫农欢喜，中农怀疑，富农怕斗，地主怕死。”³就奶奶家而言，恐惧确实成为了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

恰在此时，已经加入邻村农民会的奶奶的一位堂哥，来到她家“保媒拉纤”，跟太姥姥提议把奶奶嫁给爷爷，说他是这个区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这样就不用怕挨揍了。当时奶奶只有16岁，太姥姥虽然很不舍，但怕一家人受苦，便做主将奶奶许给了爷爷。就这样，爷爷进村没几天，奶奶就稀里糊涂地过门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土改，爷爷和奶奶很难在一起，因为当时的婚姻，主要还

1详细情况可参见伊通县志编纂委员会：《伊通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等处。

2邓烈，具体经历未详细查证，应为南方人，据奶奶说他当时是伊通县委书记，但未得到资料证实。可确定的是随军南下后，他任中共江西省委上犹县委书记，可见在东北时也应县委主要领导人。

3《刘杰同志关于察哈尔省土地改革的汇报》（1947年1月），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转引自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一期。

是讲“门当户对”，大粮户家的女儿，一般也都嫁给大粮户，或者其他有些财产的人。奶奶的姐姐就嫁给了邻村的大粮户。

在这一点上，爷爷显然不够格。他是黑龙江勃利县人，出身贫寒，为出人头地，在伪满时期当过屯长，还当过森林警察。日本投降后，在伊通县南城子加入了共产党队伍，由于作战勇敢，枪法好，很快成了干部。此时的爷爷已经31岁了，整整大奶奶15岁，还没娶上媳妇，可见家境确实不怎么样。当然，晚婚也可能跟他的“二流子”观感有关——在传统乡村，人们普遍认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分人”，而蔑视热衷参与政治、商业活动的乡村边缘人群，而最早靠近共产党的，很大一部分是这些“勇敢分子”（刘少奇语）。虽然当上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但爷爷的“阶级觉悟”显然还不够高，对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事并不上心，不然也不会同意娶地主家的女儿。不知道当时像爷爷这样对“阶级斗争”领悟不够深刻的基层干部，到底有多少。

对于这门亲事，奶奶坦承并不愿意：还是个小姑娘，啥也不懂，更离不开妈妈。但为了一家人的性命，奶奶还是选择了顺从。对此，奶奶的大爷颇为感动，捎来信说如果共产党走了，就分五垧好地给爷爷奶奶过日子。为安抚爷爷，他“仗义”地保证奶奶嫁谁就是谁了，绝不“打八刀”（老东北方言，指离婚），从此就都是一家人了。

虽然有爷爷的保护，但土地、房屋还是要分的，浮财也得分一点。因为除了土改工作队外，村里执政的还有农民会。按照标准的工作程序，工作队进村后，要宣传《土地法大纲》、开展阶级教育、召开诉苦会、成立农民会，斗争地主恶霸。但这种“工作报告”逻辑显然并不能代表底层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往往让位于征粮征兵，基层的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己的逻辑。由于爷爷本人“觉悟”不高，再加上奶奶的关系，所以当时村里政策宣传、阶级斗争教育开展得并不热烈，大多数农民对土改也就还抱着怀疑的态度——那地、那房也是人家祖传的或苦苦挣下的，咋能说拿就拿呢？而且，军容整齐、装备先进的国军就在几十里外的长春，他们在大多数普通农民看来才代表了中央正统。但共产党是讲组织纪律的，对于中心政策也必须执行，因此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比如在上级监督下分土地、成立“农民会”。定阶级，划成分，分土地、房屋、浮财，决定枪毙谁，都是农民会说了算。因此，爷爷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保护奶奶一家。最后，奶奶家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地主，因为不仅土地多，一家人还从来不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叫吃“剥削饭”。家里的地都分没了（大爷和他大儿子已想办法在外地弄到了地，家里一帮女人暂时也不需要土地了，并可借此堵上别人的嘴），东屋早已空出来作了农民会，一家老小集中在西屋，整天不敢出门。为此奶奶的奶奶一股急火去世了，而她给自己准备的棺材却早已不知道被谁拉走了。土改后，爷爷奶奶搬到了区里，大爷家的大儿媳回家了，太姥姥就连西屋都住不成了，搬进了原来作仓库的小房。不过，一大家人都没有遭受皮肉之苦，更无性命之虞，还是很幸运的。根据官方的统计，当时伊通全县“依据政府法令，处决 200 余名恶霸地主分子”，不可谓不激烈。然而，因土改而死者并不止这些，所处决的，也并不全是“依据政府法令”的“地主恶霸分子”。

二、土改 vs 土匪

在传统的土改叙事中，严重的阶级矛盾是土地改革的主要合法性依据，而阶级斗争更是土改的重要环节。就奶奶所在的村而言，土地分布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伪满时期的东北地区，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下的私有制度，农村土地处于私有状态。全村几十户人，大多姓王，沾亲带故，只有奶奶家一家地多。后来划成分时，没有富农，只有几家中农，家里各有几垧地。其余都是贫雇农，可见土地占有的差距。这些“贫雇农”有许多给奶奶家“扛大活”，条件是本人干活时管饱，年底按日结算发粮。如果他们觉得你家伙食不好或出矛盾，也可以去别人家。据奶奶说，她家伙食好，油放得多，大家都爱来她家干活。相对于典型的向地主租地交租的“封建剥削”，奶奶家的经营方式更像资本主义农场——而且从奶奶描述状况来看，粮食的商品率并不低，很多被卖掉换成生活用品了。

但当时的农村也绝不是一片“田园诗”般的美丽图景。伪满时期，日本人对粮食的征收量很大，基层官吏还时常盘剥，到抗战后期，可以想见农民的日子非常清苦。但这段日子并没有给年幼的奶奶留下什么饥饿的记忆，相反记得过年时年货挺多，橘子、瓜子、花生堆一炕，随便吃，那就不知是何缘故了。日本投降后，真正让日子过不下去的，变成了土匪，大大小小的不知道从哪都钻出来了。奶奶回忆，日本人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土匪——这些不稳定因素当然会对战略后方造成一点威胁，而剿匪也可以彰显政权的合法性。奶奶的父亲就是剿匪的时候

被打死的。政权真空导致了土匪的复兴，他们从事打家劫舍，绑架勒索的营生。土匪对于所有执政者都是一个威胁，所以当时东北的土改工作队，除了土改，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剿匪。

听奶奶说，多年后晚景凄凉的爷爷时常抱怨，说当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却落得这样。我一直没有理解当时危险的程度，直到了解了当地共产党部队与土匪、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据史料记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夕，伊通县有近百股土匪，大股有数百人，小股五至七人，在西部出没于大孤山、二十家子、靠山一带……¹虽然奶奶对这么庞大的数字产生怀疑，但当时大孤山一带土匪猖獗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官方史书中写的是，这些土匪“得到国民党伊通县保安大队和国民党在长春部队的怂恿与支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袭击民主政府，抢劫群众的车马粮食衣物，杀人放火，破坏农民运动……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支别动队。”²但实际上，早期的土匪正是靠劫掠、绑架地主为主要生路——农民没钱没粮没枪，绑架了也没用。

而此时横行的土匪中，有多少是出于“阶级报复”形成的“还乡团”式的地主武装，也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当我问奶奶是否听说过地主加入或勾结土匪时，奶奶觉得谁敢找土匪，避都避不及。当然，这也许只是老人家的主观感受——毕竟她的父亲死于土匪枪下。至于袭击共产党的部队，很多时候主要目的或许是抢劫物资——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管他什么队伍，抢了再说。

爷爷虽说对土改不上心，但打仗还是一把好手。他爱枪，且双手持枪，打起来噼里啪啦的——奶奶说，由于没事就练，村里的烟囱都没有好的。也不知道乡亲们怎么看爷爷这种“匪性”的行为，估计都恨得够呛，更有一种恐惧感吧。年幼的奶奶却觉得挺好玩，也拿过来打，结果由于枪的后坐力太大，一下子坐了个屁股墩，从此再也不张罗玩枪了。

奶奶并没有清楚记得爷爷出过的任务，但在翻看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述：1948年1月3日，大孤山区工作队，为了清除封建势力，去小孤山区马家屯搞联合斗争，土匪“双阳”勾结“万林”等200余名匪徒尾随围攻上来，

1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2页。

2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2页。

工作队组长刘德昆、队员方茂云及大桥村参加帮翻队农民积极分子王有、于青山、张花、张秃子等7人，突围时被发现，抓去杀害。杀死后，将王有、于青山尸体扔入井中。¹我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参加这次所谓的“联合斗争”²，但这些逝者中，一定有爷爷的战友。而同年2月19日，伊通县大队更是在两半屯遭遇国民党新七军正规军，伤亡达112人。³

兵荒马乱，社会失序，我觉得当时人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即使对于爷爷和他的战友们而言，所渴望的也不过是有一份自己的土地，过上安稳的日子。

三、被枪毙的贫农

在奶奶的讲述中，另一件令我惊奇的事是，土改期间奶奶所在村庄被枪毙的两个人，从成分上来讲竟都是贫农。

第一个被枪毙的贫农因为看起来病怏怏的，外号“杨丫头”。在奶奶的记忆中，这个人除了平时好打猎，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被枪毙的原因，是外地有人给他写黑信，农民会做出了决议，爷爷负责执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里有枪，又好打猎，被人诬陷当过土匪之类的。

第二个被枪毙的贫农其经历更有意味。

说起来，他还是奶奶的堂哥，总在她家里扛活。一次在她家干活时，被大爷家的大儿媳妇讽刺了几句。土改工作队进村后的一天，他来到奶奶家，找这个堂嫂寻仇。当时爷爷正在“媒人”家喝酒（给爷爷奶奶保媒的那位堂哥此时回到了本村，还是农民会文书，他的故事下面再讲），派来保护奶奶一家的哨兵也恰巧不在。奶奶赶忙跑出去找爷爷，她大爷家的这个儿媳妇则假装抱孩子拖延时间。幸好爷爷及时回来阻止了这场“斗争”。听奶奶的意思，如果打了也就打了，爷爷也不敢批评、惩罚人家，讲讲亲戚关系，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个以为有机会报仇的直人，碰上了真正懂得报仇的“聪明人”。

这个聪明人，就是前面说到的把奶奶介绍给爷爷的那位堂哥，论起来，他俩是一个爷爷奶奶的亲堂兄弟。说起这位堂哥，奶奶印象很不怎么样——他当过伪

¹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4页。

²联合斗争，即指工作队和村民可以跨村、跨区开联合斗争会，斗其它村的地主，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因为有浮财可分，所以许多农民都热衷于此。

³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124页

警察，父亲是做大夫的，家里挺富裕，但是没有地，所以没划地主；又因为能写会算，作了农民会文书。奶奶本来就对他介绍的这门亲事感情复杂，更记仇的是，他在运动快结束的时候，骗爷爷奶奶说，家里暗藏的一缸金银首饰被农民会知道了，趁早主动交上去，但最后这些金银首饰，都被他自己留下了。对此，爷爷奶奶也不敢声张。

奶奶并不知道这两兄弟之间有什么过节，总之，亲堂哥凑了材料，把亲堂弟送上了西天。

枪毙那天，这个人被从农民会押出来，还四处叫嚷着找爷爷。对此，爷爷也有些无奈，躲在屋子里（之前说过，东屋变成了农民会，奶奶一家就住在西屋）不敢吱声，从窗户缝目送了这个亲戚。

这两个人，都是毙了之后才上报县委的。当时枪毙人，没什么程序正义可以理解，但总要讲点革命正义吧？他们都不是地主，为什么会被枪毙呢？这种现象普遍么？

在纪录片《暴风骤雨》里，也有一类叫“势力分子”的非地主，成为土改的“镇压对象”。其具体含义笔者并没有查到，应该是地方一霸之类的人物。但这两个人也没什么“势力”啊！也许这就是基层史料带给人的乐趣吧——它带给你的疑问永远比答案多。

尾 声

作为一场剧烈的社会变动，土地改革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结构性贫困。几年后，农业集体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些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重新收归了国家。农民仍处于掠夺一庇护模式之下，不过土地所有者由地主换成了国家，农民更加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关于公平与正义的终极追问，也成为困扰许多人一生的问题。

而我的家族，亦被这场运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48年春天土改结束后，已经成家立业的爷爷怕“关里太乱”，只有十几岁的奶奶也不愿离开妈妈，所以他们没有选择随军南下。之后爷爷成为了所在区的区长，并很快进入吉林省委党校学习。但在1949年的整党中，他由于娶了我奶奶，被勒令退伍，后通过战友的关系到一个镇的供销社工作。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由于害怕历史问题被深

究，被迫同意下放，我们一家彻底回到了农村，而爷爷也在1973年郁郁而终。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叙述框架中，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打倒地主老财的阶级斗争。在浪漫的革命想象中，土改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平等、启蒙等一系列美好词汇相连。¹对于执政者来说，土改是征兵、征粮的现实手段，更是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但是，我想问的是，土改对于每个个体来讲，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更为复杂的图景，复杂到难以解释，难以言说：对于奶奶这个地主女儿而言，是一场并不能算完满的婚姻，对于两位失去生命的“贫农”而言，也绝不是“翻身”的快感。就像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当我们抛却加在每个人身上的符号，将历史还原为“人的学问”时，才会发现更多的苦痛、快乐与无奈。

我常常想，当已入暮年的奶奶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还珠格格》时，是否也在憧憬一场即便不轰轰烈烈，但却自由自在的爱情？而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让人生少一些“身不由己”的遗憾么？■

1 如美国学者韩丁在《翻身》一书序言中写道：“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述 往】

文 革 纪 略

——偷桃与爱书

安希孟

文革惨烈，是全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劫难；那不是解放全人类，而是幽囚全人类及其人性。或者说，我们自己幽囚了自己，自己送自己上断头台。人有自杀自虐的本能。人生就是人死。生着，活着，就是死着——向死而生呀。因了这段死亡的历程，所以就有了生的本能冲动——1976年的“四五”。这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唯一一次发自人民内心的真正的人民运动，是发自生命深处的集体呐喊，是继彷徨之后的二心，是求生的本能，是向死而生——面对死亡，却逃避死亡，追求和希冀生命。

我反对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教，因为吾人心中都有向善或向善的种子。安希孟绝然不是正人君子（那是伪君子）。我们穷，要出门就得要坐车，要坐车就得买车票，要买票就得有牺牲，在北师大乘22路车，逃票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逃票。在北师大乘22路车，下车急速拐到车尾后，心中忐忑，没听到售票员喊叫，心里的石头就落枕了，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在北大扣押董连猛期间，我无聊的时候还下山摘桃，在北大绿园，又叫生物园，偷苹果。

1971年动乱岁月毕业，受命抓捕“五一六”分子，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文革说到底，就是让无所事事的人互相掐架。但革命不妨碍偷桃。有一次批斗“五一六”完毕，我和李×、唐××回餐厅吃饭，顺便偷摘李子。你要知道李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不能只听书上说的。忽听李杰说，“来人了”。我没在意，但说时迟那时快，借眼角余光测得人影。我撒腿就跑，唐公刚从树上下来，那人从背后抱往他：“我可抓住你了，你跑不了啦”。我心惊胆寒，一溜烟窜到文史楼三楼，稍作喘息，神闲气定，再从容自得地下楼，装作是正派人，若无其事，

心想，你即使在楼里看到我，也未必认得“真凶”。我又没留下DNA。但作贼心虚的古训，还是体会到了。忐忑呀。

后来毕业分配当了老师，我就一本正经俨然正人君子。为人师表呀，原来，人是环境的产物。

文化革命中，北京师大井冈山革委会掌握了最权威的未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一共印了八册，无偿发给大家。这八本书，1980年我决绝地当做废品卖掉了，至今遗憾。

文革中，我经常套用毛泽东金口玉言。有一次开会，我说，“现在十点钟，开会”，大家哄笑。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一次我的大字报用了毛泽东“你们想逃到月球上吗？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的句段，告诫叛徒特务走资派。那是毛泽东替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的告国民党同胞书。

毛泽东亲笔书写的雄文，还有评艾奇逊司徒雷登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笔力雄健还有胡风反革命材料的按语，这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我能背诵毛泽东关于武训传红楼梦的信，以及《我的一张大字报》等。

二

我爱书，养成阅读习惯，很重要——偶有例外，高中“用阶级斗争观念分析所见所闻”，我就批判了“开卷有益”和“知识就是力量”。自己个儿觉得挺能领风气之先，绝代风华。不过，后来也知了，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之新贡献，也非其精华精髓。

我一辈子很爱读书，文革“首长讲话（包括王关戚讲话穆欣阎长贵）”，油印材料，传单小报，也不管是武汉的三钢三新，天津的大联筹，天派地派，随便炮打谁，一律免费搜求，来者不拒，一概寄回家中，都是开阔眼界，学习知识呗。1969年拿工资(薪水)后，别的同学购置新衣皮鞋手表下馆子，我却接济老家弟妹，还特别在意购书刊寄回南常村。那时的小人书，无非是八个样板戏，智取奇袭，全北师大只有我一个人十分用心地给老家弟妹邮购全套此类连环画册，一本不落。我终生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我最厌恶捣鬼走门子！

人有两面。上世纪七0年，我在北师大接受工人叔叔再教育，被贬谪到北师大后勤处劳动，修理沙发桌椅板凳，不知道怎么就忽然发现乱七八糟的仓房里散落

着一堆发霉纸质书，喜出望外。敬惜字纸，是目不识丁的妈妈用言行濡染给我的。当时劳改劳教的同伙，别人淡然置之，浑然不察，我却如获至宝，窃窃自喜，片纸只字，在我，就珍爱无比，奇货可居。这次我偷偷摸摸，晚上趁人不注意，抱回宿舍，因为那书堆中有适合我小学水平的弟弟学习的“知识”。我笃信开卷有益，比如样板戏的剧本彩照书卷连环画小人书，我都细大不捐，一体购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关于样板戏儿的评论，我都剪辑，据为己有。

最为奇妙的是，“偷书”改变命运。到原井冈山革委会作战部办公室搬桌椅板凳回后勤处房管科修理，我看见了书柜顶部一堆书（废书，抄家得来的反动书籍），傍晚钥匙未归还，晚上我偷偷溜进主楼——整楼八层空空无人，也不怕鬼——偷了几本书。其中有王力的《古代汉语》，苏联敦尼克的《哲学史》，文革前“简易版”，这是我初次接触欧洲哲学史！我后来就阅读了一丁点儿西方哲学史。

我在北师大后勤处房产科和作战部偷拿的书，大部分是阶级斗争教育，斗地主纪实，控诉万恶旧社会，控诉地主富农，反对封建压榨，歌颂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些书按印刷品寄回山西南常，只需牛皮纸包裹，邮资仅三分。后来在银川，凡高考复习班油印试题讲义，免费索取，我都卷成卷儿寄回供那个考学的作题备考。我的弟弟学问多大，我不得而知，但督促彼等读书，在我是肝脑涂地。连我也说不清，何以让弟弟们看这些书就长知识。不过与此同时，还淘宝似地偷拿了一大堆半文言体旧线装书，中华文明老古董，内容有番茄黄瓜芝麻西瓜何时传入中华，清代人著，放在床底下抽屉盒子里。七二年毕业分配树倒猢猻散，竟浑忘了带走。为此怅然若失多日。

在后勤处劳动遂成我人生的一大看点、亮点、转捩点。我于是感同身受地领会了司马氏“仲尼厄而作春秋”。自己仿佛就是屈子。劳改期间，认识地理系东北籍顾姓同学。他知识面广，给我借来印制精美的仿佛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天文地理科普书，图文并茂。受其启发，我后来阅读了科学史书籍，遂对科技史略有涉猎。后来阅读科学技术史、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就有了基础和兴致，颇觉得游刃有余。后来我竟拿到科学与宗教的国家社科项目。北师大外语系资料室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1964年批判关于文艺复兴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资料，是我当时所能获得的有关欧洲思想史的资料。我私自偷藏，只剪辑一部分留

下。

在北师大，一般而言，大学生活，课堂上得到的知识其实是很小一部分。我关于普列汉诺夫、赫胥黎传布达尔文进化论的书，不是得自课堂。西四新华书店内部书，王府井书店，琉璃厂中国书店，我常光顾。还有一个笑话，北师大外语系我们年级一位小姐，去王府井中国书店淘宝，低价购得一大摞英文《北京周报》，回家一看，是法文。因为法文北京周报，与英文形似。

我到银川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就主要参考敦尼克书。作战部查抄之书中亦有一册《外交史》，此书未引起我的兴趣。后来世界历史知识储备足够后，方知国际关系外交邦谊谈判媾和始于欧洲。马基雅维利这美丽的名字，也是后来知道的。可惜此书已不知鹿失谁手。一本墨索里尼传，也未引起我的兴趣。是后来吴振明告诉我说我有这本书。1971年有一次在文史楼108开会，黑板上有“叔本华 Schopenhauer”仨字，板书极工整，就在我心中激起涟漪。那一定是政教系某老师批林彪唯意志论。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林也没关系呀。况且意志主义哲学也不是恣意妄行胡作非为，乃警醒世人发扬蹈厉！大锅饭土高炉一平二调乱刮共产风，分明是中华特有亚细亚生产方式氏族部落。

“修辞立其诚”。我一直醉心于文章语言华美畅达，与这些书都有关系。不懂修辞的是工宣队，他们说彭真曾拟北京街道路面底下一律铺设电阻丝，下雪马路和电炉一样融冰，断无积雪——乌托邦。今天北方积雪严重也没见电阻丝。看来这是“戏说”。某工人师傅宣读“冶金部”文件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说还要批判“二类三类”骗子。看来应该有知识才行。欲有知识就得读书。■

【述 往】

北京西郊纺织大院回忆（一）

徐米甘

一、建院

微信群“纺织大院”火了，一群老三届，凭着他们文革、插队的经历，凭着他们侃大山的老北京传统，凭着他们电脑—手机的实践经验，成为东大桥中纺里历史的当然传主。我在老婆的手机上一直关心着这个群。其实作为中纺里的倒插门女婿，1990年从湖北回京后曾在大院内80年代新建的10号楼住过近三年，但我内心中的老家，是1953年到1969年度过我的童年、少年时光的西郊纺织大院——甘家口纺织设计院宿舍。

纺织系统50年代建立的“一部两院”，为新中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在北京、在中央的地位可不像今天这样低下：纺织部大楼尽管貌不惊人，但雄踞长安街畔（北京市委、市政府一直想占有这块风水宝地，但不敢强拆，至今未得逞）；纺织设计院、研究院占领西郊甘家口、东郊慈云寺最佳地理位置（一个是紧靠建设部，中央其它工业部的设计院可无此有利条件；一个是靠近东郊一、二、三3个棉纺织厂，有利于搞研究吧？）；纺织部和纺织研究院的职工家属宿舍建在了两单位之间的东大桥，纺织设计院的职工上班最方便，家属宿舍就在甘家口单位旁边。东大桥、甘家口这东、西两个纺织大院正如一对双胞胎，同时出生成长，相貌相同，性格相似。两者均于建国初期始建，扩建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相貌相同”，是因为50年代始建都参考了苏联住宅的图纸、60年代扩建也用的相同图纸；说“性格相似”，是因为住户都是机关干部及家属，且南方人居多，尤其是上海人，那是因为四九年前那里纺织业发达，四九年后调了大批行政、技术干部进京。

北京市的“东郊”、“西郊”已成为文革前的历史名词。回忆50年代的东大桥、甘家口，这里真是名符其实的郊区，两个大院没有围墙，新建的宿舍楼周围是大片的农田、荒地。60年代文革前已建起一些住宅、工厂等，大变化发生

在改革开放后，北京四周郊区界线飞速退缩，“东郊”、“西郊”这些名词渐渐无人再使用。

我的父亲1953年从上海国棉19厂动力车间调纺织部基建局，原来在厂里是从事机械设备管理，到京后转行做给排水设计。数月后母亲带着我们2、4、6岁兄弟三人和一个保姆也到京，先是在西单辟才胡同租民居住了数月，1954年入住甘家口纺织部基建局设计公司新建的住宅楼五宿舍三层，不长时间又搬入七宿舍二层中间的住宅。新建的住宅楼共四座12个单元，东边三座围成一个方形院落，东南角一座是1、2单元，西南角是3、4单元，北边一长条是8—12单元。西边靠南朝南一长条是5—7单元（当时不叫单元，就叫宿舍）。

我们住的七宿舍二层房间窗子朝西，窗外是庄稼地，远处有几片小树林，那是清朝皇族或官员的坟地，再向远可看到西山的山影。单元门前有一百年以上的古树，树上一块蓝色的地名牌写着“马神庙”。如今的“马神庙小区”在西边约2公里外的西四环边上，还有一个“马神庙1号院”，是西四环旁的核工业设计院办公一宿舍区。很少还有人记得当年的马神庙地名牌在纺织设计院的宿舍院内，现在地图上这里的正式地名是“增光路21号北院”。

东大桥的东郊纺织大院（现在地图上的正式地名是“中纺里”）开始建设比西郊纺织大院略早，大约1951—1952年就分两批建成了十几座较简易的宿舍楼，根据砖的颜色分别称为“灰楼”、“红楼”。到了1954年，与西郊纺织大院同时建成的较高级的宿舍楼被称为“新大楼”。东、西郊纺织大院这次新建成的楼房都是苏式建筑风格；大家都说苏式工业设备是“傻大黑粗”，建筑是“肥梁胖柱”，其实这里有60年代“批修”后过于贬低的成份。我认为，东、西郊纺织大院的苏式住宅楼在北京及新中国的建筑史上也有其地位；它的建筑结构特点有四：一是楼层高，室内空间大；二是墙壁厚，冬暖夏凉；三是单元楼梯每层为转向90度的“三跑”（一般住宅楼是转向180度的“两跑”，中间只有一窄缝可看到楼下），围成较大的矩形共享空间；四是楼梯间直通楼顶，楼顶地面铺有白色细石，可供人休憩及观景远眺。

50、60年代去过不少中小学同学的家，如百万庄和三里河的国家部委宿舍、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印象里没有能够达到纺织大院这批宿舍水平的。我想这批宿舍应该是纺织设计院的建筑师设计的吧？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为此没有

少受批判吧？设计革命化、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反右……，带来的是建筑设计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准的徘徊和倒退。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建设的一些居民简易住宅楼，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文革时期曾到工体游泳场游泳，从神路街下车后步行路过一排这样的简易楼，薄墙薄瓦小门窗，外形像一个个火柴盒，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二、幼儿园

都说中国人爱折腾，政治折腾、经济折腾、工业折腾、农业折腾、外交折腾、教育折腾……几十年不停歇。所谓“折腾”，就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变幻莫测；就是黄金期、衰退期、黑暗期交替出现。话说纺织业曾经走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前列。纺织业的两个黄金时期，一个在50年代初，引领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一个在70年代末，引领了改革开放大潮。

西郊纺织大院依附的纺织部设计院，始建于1952年，当时名称是纺织工业部基本建设局设计公司，经理为俞鲤庭，是1949年从香港回国的地下党员老报人，1939年在衡阳办过《大刚报》，在香港任《华商报》国际版主编。俞鲤庭作为外语人才，刚到京就被钱之光要到纺织部，转行搞工业，直到离休，30年未离开纺织设计院。作为知识分子党员，似乎不完全被信任，50年代就是设计公司的经理（改名设计院后是院长兼党委书记），反右、文革受到冲击，后来一直任副职。他的两个儿子晓东、大风是北京四中老三届的高中66、67届，可能因为四九年后工作太忙顾不上家庭生活，俞鲤庭家的老二七岁时才添了老三。文革耽误了两个儿子的学业，更惨的是才上小学五年级的妹妹俞云飞因受运动刺激患了精神病，直至80年代病故于精神病院。恢复高考后两个儿子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两人因出生于香港，根据政策户籍转入香港。听说他们并未乘香港回归之机闷声发大财，一个在大学教书，一个在公司做技术工作。

回到50年代初纺织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新成立的纺织部设计公司在俞鲤庭的带领下业绩辉煌。从1952年到1957年，在全国各地设计建造了数十座大型棉纺织企业，在北京、石家庄、郑州、西安、洛阳、邯郸等地更是建起了纺织城。在此期间，设计公司的职工也从100多人增加到700多人。为解决职工、家属的住宿，西郊纺织大院在1957年又建成了四座“新宿舍”，此后设计公司办公楼

北边与东郊纺织大院“新大楼”同时建设的住宅楼被称为“老宿舍”。新宿舍在办公楼的西南方，四座楼围成一个院落；北边的两座楼各有5个单元，由东往西是13—22宿舍；南边的两座楼各有3个单元，由东往西是23—28宿舍；南边两座楼之间建有锅炉房和洗澡堂。我们家从7宿舍二层搬到21宿舍四层，尽管层高低些、墙壁薄些、楼梯是两跑，但比老宿舍增加了木板地、阳台。

东郊纺织大院内有幼儿园，西郊纺织大院建幼儿园较晚，因此我哥哥和俞晓东、俞大风等职工子女是在西直门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寄托，星期天才回家。记得有一次我随父母去幼儿园看哥哥和其他孩子表演节目，是老四合院的房子，院子里搭有花架凉棚。我未上过幼儿园，父母让我留在家里由保姆和奶奶照看。后来纺织部设计院自己组建了日托幼儿园，我大弟弟就进了设计院的幼儿园，每天晚上回家住。到了我小弟弟该进幼儿园的时候，因为父亲经常出差，保姆已经辞退，母亲一个人照顾4个孩子有困难，就联系把他送到了东郊纺织大院的全托幼儿园。幼儿园未住中纺里的孩子，除了家长自己去接送外，部里有一辆黄、褐两色的东欧产中型轿车，负责中纺里和长安街纺织部办公楼之间的接送。我们家一般是父亲或母亲去纺织部接送小弟弟，后来我和哥哥上了四、五年级，周六下午又没课，就由我们乘3路无轨电车去长安街纺织部接弟弟。有一次部里未派车接孩子，我就乘车到东大桥中纺里幼儿园接弟弟，那是我第一次到东郊纺织大院。

西郊纺织大院附近的小学有百万庄小学、建工部子弟小学、甘家口小学、香山慈幼院。我和哥哥相差两岁，但他的生日在12月，上学晚一年，所以我们相差一个年级。1955、1956年我们先后进入百万庄小学，刚刚改名为“苏联展览馆路第一小学”。我们上学要走约半个小时，但除了入学前报名家长带领前往，从无家长接送；比较现在的情况，似乎社会退化了。我的母校作为共和国第一批建设的国家部委所属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小学校，有其先天的卓越地位和条件。明亮的教室、宽敞的楼梯、走道，比起城里那些建在大庙、旧宅内的学校，简直是高高在上了。至于这里的地名为什么叫百万庄？刚入学时我想，第一说明这里是北京城外的一个村庄，第二可能这里住的人多，第三可能这里住的人有钱。后来看了我们家订的《北京晚报》上登载的短文（可能就是在文革中狠批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栏目内），我才知道，所谓“百万庄”，实际是“百万塚”演变而来。千百年来，北京城里的穷苦百姓家里死了人，出城荒郊野外随便

一埋，时间长了形成数不清的坟头，所以有了“百万塚”的地名。后来人口增多，城近郊住的人越来越多，嫌“百万塚”不好听，就改成“百万庄”。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周围盖房、修路动土，总是挖出不少骨头、棺材板、骨灰坛。1955年，北京最高、最漂亮的建筑物——苏联展览馆在西郊动物园东边落成，展览馆正南新修的一条宽阔马路被命名为苏联展览馆路。我们学校尽管并未紧临马路，但可能是因为学校地位高，光荣地换了时髦的新校名“苏联展览馆路第一小学”。我们还未毕业，不知不觉间苏联展览馆被改名为北京展览馆，路名、学校名也相应改过，这是中苏关系变化所致，当时我们小学生还不明就里。“九评”、中学的反修（用“五笔字型”打出的是“返修”）教育似乎使我们清醒而激昂慷慨，如今看来其实有些可笑。文革是又一次更大“折腾”，建国后十七年的一切都是修正主义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胡同、街道、学校、单位纷纷改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恢复。地名就是地名，在历史中形成，只是标志和区分某一个地域，没有过多内涵的本义。我想“展览路第一小学”这个校名，数十、数百年都不会轻易改变了。■

2015年3月19日

【资料】

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1967年6月5日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亚洲、非洲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进步爱国的作家，在亚非作家常设局执行书记处的发动下，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五日聚集在北京——世界革命伟大红色堡垒中国的首都，举行纪念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的讨论会，讨论了如何把您的这部伟大而光辉的著作活学活用到我们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苏联统治集团领导下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去。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

参加座谈会的我们表示我们的信念：

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世界意义。它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给予了全世界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以最正确的政治指导。在这部光辉的著作中，您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它是最系统，最完整，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您的这部伟大的著作，是亚非作家运动和全世界人民文化革命的指路明灯。

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您深刻、系统、成功地解决了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伟大方向问题。

我们认为，正如您指出的：“文艺为什么人都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问题。”只有明确了我们创作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我们才能完成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和革命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与武装战

士并肩战斗的文化战士，在您的正确思想指导下，把我们的笔和枪都射向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心脏。

我们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分界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艺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

您教导我们，文艺为工农和人民武装服务，就是为工农和人民武装的斗争需要和根本利益服务。我们充分认识到：为工农和人民武装的斗争需要和根本利益服务，只有通过毛泽东思想鼓舞和指导下的政治，才能得到集中的表现。我们坚信您所教导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一伟大真理。因此，我们认为，为工农和人民武装服务，就是为工农和人民武装的政治斗争服务。我们反对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的代言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把文艺与政治割裂开来的阴谋。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他们正在利用文艺压制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他们正在执行一个反对革命和革命人民的罪恶政策。他们大嚷“人道主义”文艺。事实上他们创作非人道的文艺并拜倒在非人道的人们和非人道的行为之下，这就像是苏联反革命文学艺术家所做的。您正确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谓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证明了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得到人民的解放和推翻反动统治。这符合您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我们恰恰应该用我们的笔推动革命武装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成为燃烧起武装斗争烈火的木炭和柴火。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

根据您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服务的指示，我们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应该坚决地站在毛泽东思想革命的政治立场上，热情地歌唱人民，歌唱工农和人民武装，歌唱他们的革命斗争，无情地揭露人民敌人——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丑恶面貌及罪行。革命的文学、艺术家从这个武装去粉碎他们的敌人的作品。我们的这些作品应该使工农和人民武装坚信：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是完全可以伟大的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败的“纸老虎”。我们这些受毛泽东思想鼓舞和指导的作品，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

人的有力的武器”。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亲眼看到了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指导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所起的伟大的作用。这场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打到反动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就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作为世界革命强大堡垒的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使得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发抖、害怕得要死，但对亚非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来说，它是唤起他们打破被压迫剥削的枷锁和争取光明灿烂前途的斗争精神和造反精神的无比鼓舞力量。

我们看到，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武装起来的中国的革命文学艺术家，极为成功地创作出像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京剧《红灯记》，交响乐《沙家浜》，以及小说《欧阳海之歌》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是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去的样板。毛主席，您用您的诗词，为我们树立了文艺创作的典范。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艺与政治和谐地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我们认为，正如您所指出的，要创作出为工农和人民武装服务的文艺，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全身心地投身到工农和人民武装群众中去，在火热的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改造自己，逐步把立场“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我们相信，世界观的改变，是我们正确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钥匙。

革命的舵手毛主席：

您的文艺路线是完全革命的路线，您用这个路线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诞生到现在的二十五年历史，证明了按照您指引的方向去做，就推动革命的文学艺术和革命的文学艺术家运动繁荣发展，使我们的文艺创作成为革命斗争作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争取民族解放和巩固革命成果的强大武器。

我们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从心灵深处表示我们对毛主席充满崇敬的感激之情。当我们真正把您的伟大教导运用到我们经常的工作和斗争当中时，我们这种感激才更有意义。

最后我们想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和指导下，革命文学艺术家运动，特别是亚非作家一定能够达到为亚非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和革命斗争服务的一切希望。我们宣誓，永远向您学习和遵循您的教导。我们相信，背离您的教导就会带来失败和黑暗，遵循您的教导，就会带来成功和光明。

伟大、光辉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永放光芒！

光荣归于中国共产党！光荣归于中国人民！

世界革命的伟大红色堡垒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万岁！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永恒团结万岁！

祝毛泽东思想鼓舞和指导下的亚非作家常设局从胜利走向胜利！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诗人，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资料】

走毛主席指引的路

——给毛主席的信

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师《过河卒》战斗组成员

安文江 朱作富 王文英 王之平

1967年7月13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的最高红司令毛主席：

我们——您忠实的红卫兵，敬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几个六七届毕业生，我们是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下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十七年来，从那样的小学到那样的中学，从那样的中学到那样的大学，受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中毒很深。

去年六月，您老人家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天烈火使我们惊醒

起来，觉悟起来。我们开始觉得，再不起来斗争，这里要出修正主义了，而我们自己就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于是，我们起来造了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在反革命的高压下，当处于绝对少数的时候，迎着劈面飞来的一项又一项“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帽子，我们曾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我们的决心》的大字报，¹向那些镇压我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宣战，并立下钢铁誓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打起背包到工农兵中去，走延安青年的道路！

一年多过去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阎王”下去，“小鬼”上台，我们战斗组有人已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有人被分配到新华社，通知马上离开上海。今天，我们注视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领会您“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再一次学习您的伟大教导：“革命或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面前展现出一派新的天地。我们坚决要求到内地去，到边疆，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祖国最需要、工作最艰苦的地方去！走您给我们至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唯一道路！

“心事浩茫连广宇”。敬爱的毛主席，每当我们想到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就好像听到您老人家正向我们发问：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列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把我们推上了历史舞台。“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去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思潮的表现，使我们看清了十七年来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身上留下来的深刻烙印，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时时要顽强地表现出来。现在我们懂得了自己并不高明，并不高尚，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需要彻底地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掂着“无产阶级”的牌子，等着到大城市去坐大机关，当领导，我们能不能保证自己今后不被糖衣炮弹打中，不受各种“左”右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的冲击，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呢？

¹ 编者注：此份大字报时间当为1967年7月13日。

受了十几年的修正主义的教育，造了一年的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称号，我们担当得起吗？

我们忘不了下乡参加四清和劳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贫下中农中间，我们多少次拿起您的著作，下决心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

我们也不会忘记，在那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里，顶着狂风，迎着恶浪，我们放声大笑，要学搏击长空的雄鹰，不做蜷缩屋檐底下的家雀。

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去年九月，我们离开白色恐怖笼罩的复旦北上串联，九月十五那天，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我们含着热泪和千千万万红卫兵一齐涌向天安门，接受您的检阅。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们下定决心，不怕高压，不怕坐牢，不怕丢脑袋，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捍卫世界人民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让红灯永远高照，马列主义的党永不变色，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我们永远终于您，风里浪里跟您走，刀山火海，不回头！

我们既然认清您给我们指出和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决不会满足于任何小的成绩，也绝不会屈服于任何艰难困苦。因为这是在为整个无产阶级，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解放而作出自己一分必要的可能的贡献。我们的口号是“造反到底，才是胜利”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永远不会忘记您的谆谆教导，我们永远不会忘本。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劳动人民就是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做劳动人民的儿子，要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要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万次，永远和工农群众心连心。

现在是实现我们的誓言的时候了，我们坚决要求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到内地去，到新疆去，到内蒙古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附录：

我们的决心

我们十一位同志听了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激动得热泪盈眶。人民大学的同志们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我们在中文系学了四年。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向我们灌输了大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毒素，我们读的是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以周扬为首的卅年代文艺，几乎没有一本没有毒草。四年来，那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着“又红又专”的幌子，引导我们走追求名利的道路。有的工农子弟带着父母一辈子的教导，带着工农兵本色进大学，可是四年来中了不少毒。有的受党多年教导的共青团干部，被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步一步拉进资产阶级个人的泥坑……

我们是第一届完全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解放十七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十七年，劳动人民用双手把我们抚养长大，我们难道能做精神贵族，反过头去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我们怎么能眼看着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江山丧失在我们手里呢？同志们，想到这一切，我们忍不住大声疾呼：一定要粉碎一切旧制度，扫除一切旧思想，旧意识，旧风俗，旧文化！！

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大量揭发徐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徐震多年来任我们系的总支书记，他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迷惑了我们不少人，毒害了我们不少人，使我们很长时间执迷不悟。通过一年来四清运动，大学毛主席著作，我们开始觉悟过来了，如果再不勇敢地站出来斗争，我们这里就要出修正主义了！！因为这个我们曾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写出了《我们的意见》（六月二十日）的大字报，说明党委内有牛鬼蛇神，目前必须提高警惕，特别是对那些笑面虎。我们提出当时有“保卫校党委”的口号，客观上对彻底揭露问题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我们还说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要轻易下结论，我们写这些大字报是为了彻底揭露那些最隐蔽最狡猾的敌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同志们的支持，我们从自己切身的体会中，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来揭发一切修正主义言行。我们愿在革命运动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地改造主观世界，在揭发问题时，冲破一切个人主义的障碍，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管你什么地位、资格，管你什么老上级、老师，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我们就要一扫而光！要说顾虑，我们没有什么顾虑，我们心中有毛主席、党中央，有全中国的工人、贫下中农，什么也不怕！要说压

力，的确有！这压力就是钻进党内的牛鬼蛇神还没有揪出，还有笑面虎睡在我们身边！

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勇敢地向旧世界猛烈开火！这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将打起背包到工农兵中去，走延安青年的道路！■

中文系四年级： 郑家农 薛维洁 王文英 李 元
马学鸿 王之平 邢 维 朱作富
陈光祖 沈锡伦 安文江

六六年.七月十三日

选自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2）

徐振保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下），第653-657页

【资 料】

首都中学志愿去祖国边疆农村牧场插队的红卫兵战士 志愿上山下乡的革命小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1967年11月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您亲手抚育下的一批革命青年，您最忠实的红卫兵，即将踏上您开辟的革命化大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当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有多少话要对您说啊！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并作一句话：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年多来，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在这场阶级大搏斗中，我们跟着您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离您的期望还差得很远，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还远远没有毕业。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考验。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早就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国几十年来的青年运动充分证明了您的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是革命知识青年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教育阵地，利用学校的讲坛，大肆散布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剥削阶级思想，疯狂地阻挠知识青年走您指出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他们狡猾地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公私溶合论的招牌下，大肆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妄图把青年培养成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和特权阶层。然而，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几千年来的精神桎梏，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您发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下，解放军帮助我们反复地学习了老三篇、《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狠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狠斗头脑中的私字。您的教导给我们以无穷智慧和力量。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把我们的父兄从黑暗旧社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您，十几年来无微不至地关怀抚育我们成长；是您，把我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您忠实的红小兵，千言万语倾诉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热情歌颂，我们向您庄严宣誓：

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时时刻刻用您的光辉思想来斗私，批修，作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海可枯、石可烂，我们与工农群众结合，走您老人家指的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火热红心永不变！

敬爱的毛主席啊，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在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中国赫鲁晓夫在边疆的代理人已被揪了出来，这给国内外敌人，苏修、蒙修以沉重的打击。旭日东升照长空，锦绣河山展新容，边疆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陆续成立了，祖国边疆的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祖国边疆的新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誓要和那里广大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一起，把边疆建设成一道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就是要遵照您的教导，去滚一身泥巴，炼一副钢筋铁骨。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三大革命运动是我们最

好的课堂，我们要当一代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新农、牧民，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决心献身于边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过去，我们的前辈跟着您打江山，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今天，建设这一穷二白的国家的任务又落到了我们的肩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有这样的气魄，把祖国的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我们有这样的雄心，让将来的环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赤旗世界！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放心吧！千万放心吧！我们，您忠实的儿女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您的谆谆教导，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火红的革命大旗和他们用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下的红色江山，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劳动人民是我们的亲父母和好老师，我们永远永远要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向着人民的敌人，向一切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作斗争！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放心吧！千万放心吧！我们心中有了您和您的四卷红书引路、艰难险阻何所惧！刀山火海也敢闯！您的光辉思想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要用这个强大的武器统帅一切，统帅我们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切顽敌作斗争！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放心吧！我们绝不辜负您的期望，革命到底，死不甘心，永远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毛主席啊，毛主席！铺蓝天，倾东海，书写不完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和革命决心。我们三千五百多颗沸腾的红心永远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原载《兵团战报》1967年11月16日

【资料】

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向毛主席致敬电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

复旦大学“八·一八”战士向您报喜来啦！

在这东风浩荡送春归、九州凯歌捷报传的大好日子里，我们向您老人家报告

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诞生了！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又一光辉胜利！

这是您战无不胜思想的又一曲胜利凯歌！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又一丰功伟绩！

今天复旦园中红旗乱，八·一八小将心潮翻滚逐浪高。一万本红宝书在挥动，一万颗心在跳动，一万张笑脸向北京，一万个声音齐欢呼：最高红司令，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最最衷心地祝福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的光辉思想缔造的复旦大学新生的红色政权，是您的革命路线宣判了就复旦党委反动统治的最后死刑！

十几年来，杨西光、王零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复旦，疯狂地推行刘少奇、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您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反对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妄图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统治我们学校，把社会主义大学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染缸……面对这一批罪恶滔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恶魔怎能不愤怒！？

我们怎能不造反！？怎能不夺权！？春雷动地震天响。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气魄和胆略，发动了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点燃了复旦园里革命造反的星火。

打到阎王换新天，解放小鬼掌大权。在您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六·二〇”革命造反风雷动，“八·二五”杀出校门大串联，“九·二八”“乱云飞渡仍从容”，十月间杀声震地战团委，“一一·八”虎口抢黑材料，十二月炮声连天打杨王，“一月革命”转乾坤，八月天兵擒郭贼。八·一八小将顶狂风，战恶浪，缚鲲鹏，庆联合。看今朝，您的光辉思想的大旗在复旦园内高高飘扬，处处飘扬！永远飘扬！

毛主席呀毛主席，掀开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史册，哪一页不闪耀着您的伟大思想的光芒；回顾八·一八小将革命造反的道路，哪一程不是您在步步指引。

毛主席呀毛主席，正当我们响应您“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时候，您又派来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

红旗飘飘迎亲人，复旦出现了新面貌。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您的教育革命思想正在深入人心，“复课闹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透彻、最精辟的总结，是引导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路明灯。我们“八·一八”小将一定坚决地、不折不扣、全面地贯彻落实您的最新指示，闻风而动，立竿见影，字字照办，永远照办！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响应您“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炮打自己头脑里的“私”司令部，自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不断完善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使它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发挥强大的威力。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学生，革命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任重而道远，我们有志气，有抱负，披荆斩棘，百折不回，一定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用我们的双手创造出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紧跟您就有力量，紧跟您就出智慧，紧跟您就是胜利。我们向您宣誓：一辈子忠于您，一辈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一辈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永远紧跟您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选自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2）

徐振保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下），第745-747页

【读者来信】

1. 李逊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的重要差错勘误

第4页：表格左下方，“农副户口”，应为“农村户口”。

第13页：第3段倒数第3行第一个字“分”，应为“份”。

第38页：注34，“市委革常委”，应为“市委列席常委”。

第132页：注20，“文革后任中共徐汇区区委书记”，改为“文革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徐汇区区委书记”。后面？

第134页：注24，第2行“1966年1月8日”，应为“1966年12月8日”。

第178页：第2段第6行“组织部长”，应为“组织部副部长”。

第179页：第1段第9行注39，应该放到第180页第1段末。

第183页：第1段第6行最后的“红上司”，应为“上三司”。

第184页：注48第2行，“红上司”，应为“上三司”。

第186页：倒数第5和第6行，“革命委员会委员”，应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第188页：第1段第7行“是市革会中唯一的原中学生红卫兵”句删去。

第199页：注4“1934—1992年”，应为“1935—1992年”。第5行“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改为“工总司（后被追认为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主任”。（第1606页的“王洪文”条目也需修改）

第200页：第2段第1行，“1934”应为“1935”。

第204页：第2段第3行“轰动全厂”。后面加“大字报内容主要三条：（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同页页底的注16，“开除党籍。”后加“大字报内容引自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第208页：注24，“同上”应为“同注21”。

第213页：第1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应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第220页：注61第5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应为“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603页的“金祖敏”条目也需修改）。

第228页：倒数第6段，“1956年”，应为“1952年”。

第233页：小标题“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应为“文革委员会委员”。

第280页：第3段第6行，“蒋周发等11人”，应为“蒋周发等5人”。

第288页：注67“同上”，应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第295页：第6行，“七八个人”，应为“5人”

第371页：注41，“戴立晴”，应为“戴立清”。

第374页：注46，“1967年”，应为“1969年”。

第386页：注7，“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应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第422页：第2段倒数第5行，“15日”应为“25日”。

第437页：第2段第1行，“八天”应为“五天”。

第481页：第2段第1行，“12月”应为“11月”。

第485页：第1行，“杨西光”应为“杨永直”；“杨学说”改为“杨学（杨学敏——笔者注）说”；后面“（原文如此——笔者注）”全部删去。

第505页：注3第2行，“内容是什么……抓人拷打”全部删，改为“是指中共上海市委1966年11月24日颁发的关于严禁私设公堂和私自抓人、绑架、拷打的通告”。

第553页：注28，“周恩来1967年月2日”，应为“周恩来1967年1月2日”。同页注29，后面再加上“以及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1999年编《上海公安局大事记》”。

第559页：第5行，“文革中她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普陀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区委书记”，应为“文革中她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普陀区革委会主任兼区委书记”8？。

第566页：倒数第4行，“第十五章”，应为“第十二章”。

第593页：第2段第2行，“第一期”应为“第二期”。

第609页：注92，“1月5日”应为“1月9日”。

第627页：第2段倒数第4—3行，“工龄在十五年以上的占百分之七”，

应为“工龄在十年以上的占百分之七十”。

第667页：第2段第1行，“23个”应为“32个”。

第670页：传单《紧急通告》群众组织署名，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之后，还应加上6个组织：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第684页：第4段第6行，删去“向市革会”，应为“……工厂统统向火线指挥部汇报……”。

第685页：倒数第6行，“1月5日”应为“1月9日”。

第688页：最后一段第1行起，“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中央贺电，转载《紧急通告》，并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改为“1月1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全文转载《紧急通告》；第二天，又刊登中央贺电，并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第734页：倒数第6和第7行，“陈佩华”，应为“程绮华”。

第749页：第2行，删去“上午10时”。

第803页：第9行“要陈伯达写检讨”后，删去“毛泽东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给陈伯达和江青开民主生活会”。后面的内容改为：

王力还回忆说，毛泽东不是对张春桥不满，他是对陈伯达不满。张春桥在接到毛要他成立上海夺权机构后，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宣言、形式、以及成立时间，所有具体事宜，都直接向陈伯达汇报请示。王力认为，可能张春桥以为，既然是毛泽东让成立的，就不用再直接请示了。但如此大事，陈伯达却没有再向毛泽东请示，而就在这几天，毛泽东对公社想法又改变了。可上海的公社却成立了。毛泽东因此对陈伯达非常不满，说他不请示汇报，对江青也有意见。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请示报告制度，说话随便，要陈伯达写检讨。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不见报，就是毛泽东布置的。2月6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说到上海的夺权，毛泽东批评说：

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这里标注46，注46的内容全部修改为：《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5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

毛泽东的这段话，引发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对陈伯达的质问，说陈伯达等擅自改变国家体制名称，要陈伯达解释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

毛泽东发觉了随便改变政体称呼将引发的麻烦。毛泽东并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给陈伯达和江青开民主生活会。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下了飞机就直奔毛泽东处。毛泽东穿着睡衣等着他俩。毛和他们商量，上海人民公社是否能够改名，和别的省市一样都叫“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涉及到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还涉及到外国承认问题。张春桥、姚文元当场做检讨，说自己考虑欠周到妥当，还是主席高瞻远瞩。

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秘密去北京的，除了徐景贤，没有一人知道。为了不让任何人包括机关联络站的人觉察张姚不在上海，徐景贤每天都去张春桥住处，通过加密电话，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情况，然后又在第二天，向大家传达张姚指示，仿佛他俩还在上海。直到一个星期左右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

下面第3段“就在毛召见张、姚前一天……抑或两者都有”，整段全部删去。另起一行接最后一段“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秘密去北京的……”。

下面的注46，原来内容删去，改为：《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5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

第821页：第3段第3行，“两个星期后的1966年12月下旬”，应为“两个星期后的1967年1月上旬”。

第828页：注40第2行，“1973年”，应为“1979年”。

第835页：正文第2段倒数第2—3行：“上海造反派召开代表大会”，应为“上海工人造反派召开代表大会”。

第847页：注90第1行，“徐美英常委，”，删去“常委，”。

第849页：第7行“到1968年底”，改为“到1967年中期”。

第863页，表格排版因出版社转换格式出错，原文排版如下：

分 类	合计	属 红 卫 兵 指挥部一方		属串联站 一 方		不 参 与 或 不 表 态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领导干部合计	260	182	70	59	23	19	7
1. 厂党委委员	17	13	76	2	12	2	12
2. 十七级以上干部（除党委委员）	17	16	94	1	6	—	—
3. 正副科级干部（除上二项干部）	94	50	53	32	34	12	13
4. 工长级干部（不包括组长）	44	31	71	10	22	3	7
5. 政治工作干部（除上四项干部）	88	72	82	14	15	2	3

第 876 页：第 1 段第 5 行“权力财产再分配论”，应为“权力再分配论”。第 2 段第 4 行“支联站成立大会上”，应为“支联站的大会上”。第 3 段倒数第 1 行，“东海舰队海军司令员高志荣”，应为“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

第 906 页：注 125 第 5 行，“19 日”，应为“29 日”。

第 906 页：第 1 段第 3 行，“直到国庆前夕”，改为“直到国庆节前”。同页注 125，从第 2 行“；但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正好赶上国庆节”全部删去。

第 920 页：第 2 段第 4 行，“上海警备区军代表”，应为“空四军支左办公室负责人”。

第 936 页：第 1 段第 12 行，删去“这次炮打中表现坚定的同济大学的陈敢峰和”。

第 943 页：第 2 段第 2 行，“上海市革会成立第二办公室”，应为“上海市革会成立第二项目办公室”。

第 972 页：注 41，“1867 年”，应为“1967 年”。

第 991 页：倒数第 2—3 行“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写作组。”，改为“红

卫兵、工人造反派、机关造反派；而机关造反派的核心实际是写作组”。

第1008页：第2行，“工总司在各革命委员会”，应改为“工总司在各区革命委员会”。同页最后一段，“9月中旬”，应为“8月中旬”；“张春桥在8月”，应为“张春桥在9月”。

第1026页：注63，“1967年10月27日”，应为“1967年11月3日”。

第1034页：第3段第1行，“1968年4月15日”，改为“1968年2月”。同页倒数2行，“到1967年月以后，增至200人”，应为“到1967年5月后，增至200人”。

第1039页：最后一段第5行，“刊登在1968年9月25日的报纸上”，应为“刊登在1968年9月26日的《工人造反报》上”。同页同段第7行，“再写文章论复旧，但不再提复辟。”，改为“再写文章《坚决反对复旧》，但不再提复辟。刊登在10月16日的《工人造反报》上。”

第1044页：第4行“决定建立上海工会系统的造反派联合组织”，改为“决定建立各造反队的联合组织”。

第1046页：倒数第2段第2行，“1949年前也是这样称呼”，应为“1949年后也是这样称呼”。

第1056页：第2段第6行，“王成龙”应为“王承龙”。

第1059页：倒数第11行，“三月初的一天下午”，改为“公社成立后的一天下午”。

第1148页：注39（也包括1063页关于胡永年的条目），全部修改如下：

胡永年，男，文革前是足球运动员。文革初期造反，是造反派组织“上体司”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再后又减为18年有期徒刑；2014年病逝于上海。

第1175页：第9行，“老干部王克、王一平、军代表”，应为“老干部黄克”（删去“王一平、军代表，”）。第13行“由老干部张辑辑五负责，加上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以及工宣队的王明龙”，改为“由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负责，加上老干部张辑五，以及工宣队的王明龙”。

第1188页：倒数第5行，“先天权力”，应为“先天权利”。

第1192页：第2段“江青讲话后不久”，删去。

第1199页：“胡守钧小集团案与一打三反运动”一节，所有的“胡守钧”因为简繁体转换错误，“钧”字全转成了乱码。

第1202页：倒数第5行，“邱励鸥”，应为“邱励欧”。第1605页的“邱丽欧”目也需修改。

第1212页：第2段第3—4行，“总部和造反派计449人”，应为“总部的造反派头头计449人”。

第1220页：第2段第10行，“常委中的杨富珍”，改为“委员中的杨富珍”。

第1231页：最后一段第3行，“工人8名”，应为“工人7名”。

第1238页：倒数第2行，“校领导由总工会委派，最初是原来的老干部江征帆。”全部删去，改为“市总工会委派了校领导小组，负责人是工人新干部江广征。”。第1259页：注18，“同上”应为“同注16”。

第1284页：第6行，“1975年姚文元的……”，应为“1975年张春桥的……”。

第1312页：倒数第4—5行，“而在本书第三十一章所引用的那份工总司1970年的调查表格中”，改为“而在工总司1970年的调查表格中”。

第1314页：注7，后面加“这份表格中所统计的下去人员，都是区和局一级工会的人员。”第2段第3行，“占全局造反派头头的50%左右”，改为“占50%左右”。

第1343页：第1行，“1968年”，应为“1967年”。

第1348页：注14，删去第2行的“，工总司1967年5月2日”。

第1355页：第2段第5行，删去“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第1363页：第2段最后，注解数字42前，加“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所以叶帅叫我来，我也不好推辞”。下面一行“显然，王洪文存心……”，改为“而且显然，王洪文也有存心……的不满之意”。

第1371页：注54第1行，“公安部副部长”，应为“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第1381页：倒数第3行，“但实际上，主持工作的一直是”，改为“但实际上从1968年起，主持工作的一直是”。

第1409页：倒数第2行，“第一次在1967年底”，改为“第一次在1967年4—5月间”。

第1410页：第2段，“第二次是1969年4月至5月间，主要是调查造反派新干部犯错误类型，以及其中一些人被审查、拘留、逮捕情况，为办工人政校、对工人造反派进行政治教育和培训提供参照。¹⁴经市革会同意，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人政校开办。”

这一段改为“第二次是1969年4月至5月间，主要是调查被审查、拘留、逮捕的造反派新干部情况。共调查30人，其中即将结案15人，尚未结案15人。¹⁴”。（保留注14）

第1425页：倒数第3行，“1973年”，应为“1971年”。

第1446页：第8行，“要利用这些流氓”，应为“只要利用这些流氓”。

第1471页：第2段第4行最后，“1966年”，应为“1967年”。同页倒数第2行，“1966年”也应改为“1967年”。

第1474页：倒数第6行，“复刊号总第3期”，应为“复刊号总第43期”。

第1478页：正文第1段第1行，“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标明是”，应为“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标明是”。

第1478页：注17，第3行，“第一期的第三版”，应为“第二期的第三版”；这个注的倒数第2行，“倒填第一期”，应为“倒填第二期”。

第1518页：第1段倒数第5行，“这在前面的第22章”，应为“这在前面的第28章”。

第1520页：第3行，“徐景贤所以说”，应为“张春桥所以说”。

第1526页：注50第1行，“二千人以上”，应为“千人以上”。

第1528页：第2段倒数第2行，“职能科室，工作在接受所在单位党委”，改为“职能科室；在接受所在单位党委”。此段下一行，“也接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业务领导”，改为“也接受区民兵指挥部的业务领导”。

第1528页，注52第3行，“『文攻武卫的负责人』”，改为“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第1532页：第3行，“只有上海是民兵”，改为“只有上海还叫文攻武卫指挥部”。下面第6—7行的“民兵指挥部”，也改为“文攻武卫指挥部”。

第1555页：倒数第5行，“一万五千万发炮弹”，应为“一万五千发炮弹”。

第1567页：注33，删去“黄金海在看了笔者的书稿后，提出他们不认为会在这个名单上。”

第1587页：倒数第2段第2—3行，“戴立清是12日晚上连夜从安徽小三线赶回上海的”，改为“戴立清是12日晚上，被叶昌明连夜从地处郊县的奉贤干校市委读书班，叫回上海的”。

第1589页：注81第1行，“王明龙”，应为“王成龙”。

第1594页：第2段，“上海因文革或党纪处理的”，应为“上海因文革被刑事或党纪处理的”。

第1594页：倒数第10行，“胡永年，被判无期徒刑，后保释，2014年病逝于上海”，改为“胡永年，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再后又减为18年有期徒刑；2014年病逝于上海”。

第1599页：倒数第11行“王维国”栏，“空四军第一政委”，改为“空四军政委”。

第1600页：第5行“周壁”栏，删去“少将，”。

第1604页：“马天水”栏第2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主管上海工作”，改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主持上海工作”。

第1605页：第一行，删去“及副主任”。

第1608页：倒数第2行，“红上司”应为“上三司”。

第1614页：“红三司”的“成立时间”栏，“从红上司分裂成出来”，应为“从上三司分裂出来”。下面的“所办刊物”栏的第1行，“创刊号和第2期都由红上司主办”，应为“创刊号和第2期都由上三司主办”。

第1620页：第7行，“5.《工总司简报》，铅印16开，目前所见出版至第126页。”，改为“5.《工总司简报》，铅印16开，目前所见出版至1968年12月22日第126期。”。（加“1968年12月22日”）。

第1621页：“三兵团”的“参加对象”栏，“到达南京”，应为“步行至安亭”。

第1626页：第6行，“《新闻战士》”后的“铅印4开”，应为“铅印对开”。

第1632页：最后的注，删去整个第3条，第4条，改为第3条。

第1645页：倒数第7行，“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23日”，应为“1965年11月至1967年2月23日”。

2. 越人、汪春劼谈王海光文

新的一期《记忆》收到，本期王海光的文章不错，文革社会史的研究相当有价值。记得多年前在一个论坛上和青近军（陈益南）、一听（叶曙明）兄等讨论文革时说过一句，文革中最惨的是黑五类，而那些联动、西纠之流不仅受的苦不多，后来还成了第三梯队。在其父辈创立的伊甸园里尽情享受（单世联有句话说得很妙，“革命之于革命家们的真正意义：要在孤苦的人间建立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但普通人却需要告别这种革命。”单世联：《罗点点：中南海的权力游戏》），文革中普通的受害者的冤案确实需要更多的关注。冯骥才那本《一百个人的十年》第一篇《拾纸救夫》的结尾一段话导出了残酷的真相：“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不过王海光兄说到刘少奇和林彪，当然也是意有所指。个人觉得，当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基于基本的良知不接受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而今天当刘又被供上神坛的时候，人们对于刘在晋绥土改、四清中的恶行也会逐步有清晰的认识与批判。对于林其实也是如此，而林现在所处的地位跟刘的前一阶段也好不了多少，作为文革罪恶的两大官方屎盆子之一，真的是多少罪恶借林之名而行之。文革中林也确实有整人恶行，但如以整人搞阴谋来概括林的文革生涯则恐有偏颇片面之处。至少根据现有史料，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在文革中都有“整一部分人，保一部分人”的历史记录。深入探讨与林有关的事实真相，倒可以让我们对文革中整个高层群体的实际作为有更准确的把握。正如千秋兄所言，“对人民来讲，林彪案件是历史，人民需要了解其中的真相。”（千秋：《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搞清和林彪相关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史实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越人 2015-6-4

《记忆》刊发的王海光先生大作，好读也耐读。其文好在两个方面：其一“食材”好。文革中受冲击的草民无计其数，留下完整档案材料的估计不多，即使有，也藏之名山，难睹芳颜，而王先生却能遇到这份宝贝，运气不错。其二手艺高。好“食材”只有在技艺精湛的大师手中，才能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王先生之文既有完整的叙事，梳理出贱民柳福禄在新社会所遭受的诸多磨难；又有深入的解读，揭示出冤案发生的机制，宏观的斗争哲学带来的草菅人命加上基层权力的拥有者公报私仇，才把柳福禄送进了可怕的炼狱。

柳福禄与我的父亲差不多是同龄人，柳福禄的子女与我一样都是60后。真希望此文还有续篇，通过口述历史，采访柳福禄的家人，了解他们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生态下是如何熬过长夜的？了解那些悲剧的制造者以后又有哪些忏悔与反省？了解当年的受害者与制造者现在生存现状。

柳福禄悲剧最大的根子是“反革命罪”，这是批量生产政治冤案的“发动机”，所幸其1997终从刑法中消失。这一罪名在中国存在70年，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远远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与深入的思考。

汪春劼 2015-6-2

3. 张晓良纠错

读《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让我想起，在乡村读小学时，记得某次全校大会，说是出了“反标”（反动标语，具体内容不说，因为不宜扩散），要对笔迹，最后不了了之。

14页8行，“刘福禄”，应为“柳福禄”。

14页正文倒数2行，“许家孩子”，应为“徐家孩子”。

36页4行，“许连玉”，应为“徐连玉”。

69页5行，“长茅”，应为“长矛”。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